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84 号
出版日期：2026 年 4 月
电 话：(029) 85260983
邮 编：710061
电子邮箱：sxsyxb@ 126. com

2026 年 4 月 10 日出版

目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论述	熊成帅 孙淑颖 (5)
“两个结合”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之路	李凌波 李 钢 (11)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内涵·特征·路径：新时代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三维审视	杨 勇 纪柏伦 (1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其优化路径	刘 蕊 (2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李娜萍 王晓璿 (29)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情感建构机制与实践路径	梁健晟 王佳桐 (35)
新形势下加快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研究	刘 利 (42)

期刊基本参数：

CN61-1321/D * 1992 * A4 * 64 * zh * P * ￥7.50 * 2000 * 13 * 2026-02

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

以“情感相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与现实路径

..... 张 凤 武永江 (48)

观察与思考

厚培文化根脉，留下千年传承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方法研究

..... 史永哲 宋 锋 (54)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

——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路径分析

..... 张进蒙 张思宇 (60)

声 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凡是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各种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本刊顾问

崔 歆 周 静 袁炜伟 朱 丽

编辑委员会

袁炜伟 燕连福 苏玉波 陈晓莉
何 诚 张 涛 尹夏清 王西军
张 玮

主 编：袁炜伟

执行主编：张 玮

编辑部主任：王目星

责 任 编 辑：蒙晓哲 王晓璿

黄晓翠 唐 倩

马文婷 李 蕾

张嘉瑶 刘 悦

宋帅华 龚 苏

程凯丽 章雅昭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论述

熊成帅 孙淑颖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与重大意义，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与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讲话精神，要深刻理解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铭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抗战胜利有力证明，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抵抗强敌、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的格局与担当。

关键词：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纪念 中华民族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6) 02-0005-06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要求共同铭记抗战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习近平的讲话阐明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与重大意义，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与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与

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五个层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1]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收稿日期：2026-02-15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高教研究基金委托项目“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引领体系研究”（GIIW2026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熊成帅，男，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孙淑颖，女，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抗日战争的论断,需要把握抗战的艰苦卓绝与伟大历史意义。

抗战之艰苦,源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对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侵略中国前,日军大量囤积粮食、燃料、枪炮弹药,为战争作足准备。彼时中国积贫积弱,武器装备简陋,物资极度匮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已是工业国,整个社会转变为战争体制,中国则依然为农业国。1936年,日本的工业GDP是中国的4.4倍,日本的年钢铁产量是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2]。1938年,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3]日本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

由于日军的残酷封锁与野蛮“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极端艰苦的困难环境之中。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日军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的生存基础。根据地地处农村且多为贫瘠山区,自然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敌人持续的经济封锁和资源掠夺,根据地军民一度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经济几近陷入绝境。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回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4]此外,战争使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抗日力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心理考验。自然灾害如蝗灾、旱灾等频发,更是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程度。

同时,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发起“扫荡”,给根据地民众造成深重灾难。日军占领村庄后,时常向群众勒索。“群众为免于难,将棉被、衣服甚至布片悉数交出,而敌寇犹未满足,大挖人民的祖坟与房屋,以搜获东西”。日军不仅抢掠粮食财产,还抢掠妇女和青壮年劳力。“寇兵还趁开会集合的机会,大批捕捉青年壮丁。强奸妇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子有不少

的亦竟被奸污。”^[5]为摧毁根据地民众的反抗意志,日军常假借搜捕八路军的名义,血腥残杀根据地民众。在冀中根据地,日军经常集合民众并揪出个别人来讯问“有无八路军”或“谁是抗日干部”,如果回答“没有”或“不知道”,日军“即冷水灌满肚腹,再加压挤,水从口中流出,然后再行灌入,至死为止,或者以刺刀穿入腹中,挑出肠胃心肺,以一儆百”^[6]。进犯根据地村庄的日军部队一路屠杀民众,强奸妇女,放火烧村,无恶不作。

在此局面下,抗战之伟大,正体现在中国人民意志与精神的空前觉醒。十四年烽火硝烟,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艰苦的环境没有摧垮抗战军民的斗志。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彻底的牺牲精神,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部队在敌后探索了破袭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游击战术,均需依靠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正规军的密切配合^[7]。在交通战中,为阻断日军交通,中共部队竭力破坏公路,但破坏后日军又将其修好,“我们组织群众反复破,敌人又拉夫反复修”^[8]。有的地方反复三四次后,日军人力终于不济,僵持局面才被打破。在水上游击战中,部队动员群众在河道上到处打坝,阻挡日军汽艇进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记录,在苏北根据地串场河,“群众日夜在河岸打坝,敌人白天开坝,夜间又打起,上午开掉下午又打起,整整一个月没有顺利通行汽船”^[9]。中国人民为抗战作出的牺牲,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坚定意志与坚强决心。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将群众组织起来,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

抗战之伟大,体现在中国人民以千万人的牺牲开辟出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对侵略,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从平型关大捷到台儿庄血战,从百团大战到远征军入缅,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军民一体

浴血奋战，谱写了壮丽的抗战史诗。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成为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一胜利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正义事业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

二、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

在这场决定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以巨大牺牲、顽强意志和卓越智慧，向全世界展现了强大的民族力量与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

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不畏强敌的伟大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极其野蛮、极为残暴，其手段之残忍、破坏之巨大、意图之险恶，世所罕见。日军实施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企图以恐怖政策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面对侵略，中国人民发出“保卫全中国”的呐喊。从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到敌后战场的反复争夺，从城市巷战到农村游击战，中国军民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彰显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士气；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重创日军精锐，展现了拼死抗战的决心。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的敌后游击战，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华民族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的伟大民族。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华民族依靠自身力量和少量国际援助坚持抗战近十年之久。抗战期间，中

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武器装备低劣，物资极度匮乏。面对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与持续“扫荡”，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和爱国工商业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维持生产，支援前线。许多工厂、学校历尽千辛万苦内迁到大后方，保存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命脉。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科研和技术革新，积极为抗战服务。抗战时期的这些创举，体现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民族特质。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华民族超越阶级、党派、地域的界限，团结起来共抗外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大义为先，凭借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重要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力量基础，为抗日战争营造了有利环境^[10]。国共两党合作抗敌，中国军队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殊死抵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爱国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海外华侨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许多华侨青年甚至回国参战，血洒疆场。文艺界人士以笔为枪，创作出大量激励斗志的作品；科学家、教育家们在战火中坚持教学科研，延续文化薪火。大后方民众竭尽全力支援抗战。在生死较量中，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了世界和平。

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伟大，不仅体现在她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文明，更体现在她于危亡之际所迸发出的惊人生命力、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和品格是一次极限考验和全面洗礼。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不仅为民族复兴开辟了光明道路，也捍卫了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为拯救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贡献巨大

对于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1]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坚持最久,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与持久抵抗,不仅开辟和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或阻止了日军对亚洲更多国家的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提供有力策应。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高举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义旗帜,为抗击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凝聚全球正义力量。战争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深刻影响战后世界格局。中国人民取得的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捍卫人类文明意义重大。日军侵略中国与东南亚多国时,野蛮屠杀平民,大肆进行细菌战、化学战,屡屡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犯下滔天罪行,对许多国家造成深重灾难。轴心国集团在世界各地肆意挑起战争,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造成严峻挑战。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日本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七成以上,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烈代价。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人。按1937年比价,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12]。中国军民的奋斗,使人类文明免于法西斯的黑暗统治,为人类文明的存续筑牢坚实堤坝,为捍卫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世界和平。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野蛮计划,还极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深切感受过战争灾难痛苦的中国人民,在取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之后,始终将反对战争、捍卫和平作为基本的价值

观念。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原则积极参与创建战后国际秩序,战后80多年来始终在战争与冲突中劝和促谈,成为和平的捍卫者与守护者。抗战结束后,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也决不侵犯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经过70多年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成果,联合国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殷切期望,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人类文明免于战火威胁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历经无数风雨洗礼,始终牢记使命担当。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肩负着神圣使命,为捍卫民族利益、保卫人民生活幸福屡建功勋。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华南开辟敌后战场,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力量,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日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取得平型关大捷,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新四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顽强地坚持斗争,创建了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敌后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3]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 14 年，歼灭日、伪军 20 余万人。人民军队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传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1944 年，毛泽东在主持修改《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14] 1945 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紧紧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支人民军队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16] 习近平要求：“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永远不能变，老红军的传统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改。”^[17] 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等关键时刻，解放军战士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为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挺身而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围绕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人民军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守红色传统，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始终是党和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英雄军队。全军将士忠实履行神圣职责，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五、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致，为

国家生存、民族复兴和人类正义而战斗到底。如今，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当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再次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的历史抉择之时，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保卫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捍卫无比珍贵的人类文明。习近平深刻指出：“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18] 坚定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思维，对中国而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源于历史深处的文明自觉。从抗战胜利到民族复兴，从东方主战场到世界和平建设者，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人民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要谋求共同发展不要敌对霸凌，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这是人类应该走向的文明之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捍卫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今天中国依旧倡导文明对话，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推动世界走向合作稳定与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在庄严盛大的阅兵式上，包括空警-600、运-9 多型特种机、运-20B 和运油-20A、歼-35 和歼-35A、歼-20S 和歼-20A 以及歼-16D 等十几种新型战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展示出今日中国强大的军事战斗力^[19]。紧接着，象征和平的八万羽和平鸽飞向蓝天。纪念活动中的这一精心设计，体现了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志。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国际正义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同时，中国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

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二战胜利的重要成果,构筑起守护人类远离世界大战惨祸的制度屏障。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国际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国家企图借挑起国际争端转移内部矛盾,部分地区陷入安全困境,全球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正在加重。面对挑战,中国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朝着平等有序和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为首要前提,以遵守国际法治为根本保障,以践行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以倡导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以注重行动导向为实践方略,生动体现出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20]。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类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原则的企图,致力于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平衡各方利益基础上,推动全球性问题得到持久公正解决,成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要捍卫世界和平、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鼓吹战争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矢志不移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的中华民族,始终是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捍卫者。面向未来,既要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锲而不舍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又要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为与各国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澎湃动力。

【参考文献】

- [1] [11] [18]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5-09-04 (03).
- [2] 刘庭华. 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G].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5: 309.
- [3] 毛泽东. 论持久战 [J]. 解放, 1938 (43): 1-42.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9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17.
- [5] [6]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 [G].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210, 211.
- [7] 熊成帅.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 [J]. 河北学刊, 2023 (2): 216-224.
- [8] 王平. 王平将军自述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154.
- [9] 黄克诚. 盐阜区反“扫荡” [J]. 真理, 1943 (13): 65-74.
- [10] 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J]. 求是, 2025 (16): 56-60.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坚定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J]. 求是, 2025 (12): 64-68.
- [13]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2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40.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2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26.
- [1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34.
- [1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7-10-18 (01).
- [19] 战鹰呼啸! 空中梯队震撼登场 [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532778, 2025-09-03.
- [20] 杨一凡. 全球治理倡议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6): 25-37.

责任编辑: 宋帅华

“两个结合”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创新发展之路

李凌波 李 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余年伟大成就的思想根基和命脉,“第二个结合”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源泉和血脉。把握好“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两个结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确立了目标导向,指明了发展路径,提供了建设成效的评判尺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又为“两个结合”提供了落地生根的实践进路和意义延展空间。

关键词:“两个结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6) 02-0011-06

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其意义的重申,再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创造性提出“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必须坚持走好“两个结合”这条必由之路。深入探究“两个结合”生成的内在机理与创新逻辑,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演进的目标和规律,可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进而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筑牢思想之基、开拓力量之源。

一、“两个结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必由之路”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出“两个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必然性和方向性意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路径指引。

收稿日期: 2026-02-15

基金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GXZY2306)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19BKS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凌波,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意识形态;李钢,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意识形态。

(一) 历史发展的客观结论: “两个结合”作为“必由之路”,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根本路径

习近平指出,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 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从历史进程看, “第一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全过程。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确立“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原则, 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党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 开启了“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的伟大征程; 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为实现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百余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5]。“第一个结合”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的思想根基与理论命脉, 其核心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6]。基于这一“中国的特性”, “第二个结合”从文明根源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 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7]。坚持走好“两个结合”这条必由之路, 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又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遵循。

(二) 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两个结合”作为“必由之路”, 是新征程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根本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

题,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8]在理论创新方向上, “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9]。这一创造性的融合,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0], 从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实的思想根基与文化支撑。在实践创新方向上, “两个结合”贯通了理论创造与现实变革的双向互动。习近平强调: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1]“第一个结合”要求立足中国实际, 在回应时代课题中推动理论创新; “第二个结合”则为这一过程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滋养, 使理论创新发展既葆有真理品格, 又富有文明气韵。二者的有机统一,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守科学真理性, 又焕发时代生命力。

基于历史与未来的双重逻辑, “两个结合”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核心主线, 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 也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科学路径, 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守正创新的根本遵循。

二、“两个结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引

正如习近平所言,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2],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质上就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 就是促进“经济中心工作”与“思想文化工作”的相互适应、相互匹配、协调发展。为此, 必须厘清“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 以目的性、原则性、导向性统摄总体工作布局。

(一) “两个结合”为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了崭新的生机活力

“两个结合”贯通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逻辑,持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鲜明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指向,使其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发挥方向指引与旗帜引领作用。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13]“两个结合”贯通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内在逻辑,使马克思主义在深厚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养分,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彰显真理价值与实践伟力,焕发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思想力量。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先进社会意识对社会历史变革的引领作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旗帜引领。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14]“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在实现文明传承与理论创新内在统一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坚持“两个结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展现出直抵人心的价值感召力,在守正创新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奋进力量。

(二) “两个结合”为意识形态建设构筑了明确的目标导向

“两个结合”作为党在百余年奋斗中形成的科学方法论,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引领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沿着科学性、民

族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方向推进。

“两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原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理论根基。习近平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15]当前我国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发展时代,这决定了在“两个结合”指引下进行意识形态建设,首要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两个结合”夯实了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6]“两个结合”以文化自信为基石,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注入深厚文化滋养,激发中华民族自信自立、奋发向前的精神活力。

“两个结合”以党的领导为政治前提,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作为先进思想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7],充分彰显了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重视。在党的领导下,“两个结合”成为将科学理论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关键桥梁,持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引领力、思想凝聚力与实践感召力,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三) “两个结合”是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评判尺度

坚持“两个结合”作为根本标准,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使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与实践力量。这既是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动力,也是检验其实效性的核心标尺。

一方面,“两个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标准,成为衡量其正确性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明确指出:“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18]这充分表明,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正确理论为指引,确保其始

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的高度自觉与战略主动,为衡量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提供了科学评判标尺,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舆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发挥引领作用,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主权构筑起坚实思想屏障。

另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的人民立场,突出意识形态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其现实回应与实际效果。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 人民群众的接受度、认同度与参与度,是衡量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作为“两个结合”的内在要素,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其价值指向高度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因此,唯有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在融入群众生活中凝聚广泛共识,充分发挥其思想引领和价值整合的重要作用。

三、“两个结合”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中的实践展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具象性、落实性形式,亦为“两个结合”提供了落地生根的实践进路和意义延展空间。

(一) 以“两个结合”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

“两个结合”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立场与根本方法,是确立思想共识、引领价值认同的根本依据。面对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唯有在推进“两个结合”中不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引领力,才能夯实全党全社会的思想统一与价值共识。

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根本路径。“两个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构建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特征与人民立场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为意识

形态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价值内涵。由此,坚持“两个结合”成为推进理论守正创新的内在要求、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关键支点。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掌握群众,理论武装工作必须同步跟进。因此,必须持续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重要作用,使其真正转化为全党全社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与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0] 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引领,更依赖于制度层面的保障。“两个结合”正是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既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也为制度体系完善指明实践路径。为此,必须以“两个结合”为统领,健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21]。通过制度优势推动“两个结合”的实践转化,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引领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思想保障。

(二) 以“两个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力

进入全媒体时代,传播渠道的多元与覆盖范围的扩展,固然拓宽了主流声音的传播空间,但也使传播效能面临稀释风险: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分散,圈层分化加剧舆论引导难度,多元话语并存使话语权竞争更趋激烈。面对这一复杂的传播生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从内容生成到话语体系进行系统重塑,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

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通过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立得住”。在信息高度碎片化、媒介高度个体化的全媒体时代,传统的单向灌输式传播已难以适应公众的认知需求,导致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接受力不足、共鸣度不高的困境。作为意识形态的感知载

体,话语体系亟须顺应传播生态变革,而“两个结合”正为这一转型升级提供了实践路径。在叙事层面,应讲好“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成就,强化意识形态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阐释力,提升其理论深度与现实穿透力。在表达层面,应注重话语方式的创新转化,以贴近群众的语言营造双向互动的传播氛围,真正实现“润物无声”的引导效应。具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自觉承担桥梁角色,突破知识圈层与表达隔阂,真正做到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媒体平台应推动传播范式由大众化向精准化演进,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内容的点对点投送,增强话语的针对性与感召力。

另一方面,立足“两个结合”的价值理念,构建国际化传播体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得开”。习近平提出,“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2]。这为意识形态话语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坚持“两个结合”,要以“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谋大同”的中华文化基因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打破西方偏见叙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传播路径上,应立足全球传播格局变化趋势,加快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国际传播体系,善用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先进技术,提升内容表达的精准度与渗透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3]。

(三) 以“两个结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感染力

情感作为一种兼具规范性与稳定性的心理力量,是意识形态扎根民众内心的深层基础。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做政治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4]为此,必须立足“两个结合”,贯通历史与现实、融通传统与当代,以中国精神涵养时代情感,以中华文化激发内在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理论自

信”走向“情感共鸣”,由“价值引导”转化为“行动自觉”,持续夯实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与情感支撑。

一方面,通过“两个结合”培育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夯实情感基础。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持久认同,其力量正源于情感深处的归属与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归宿与价值信仰;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承载着家国理想情怀,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根基与情感资源。新闻舆论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引,深入挖掘历史叙事中的民族记忆与精神传承,让“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与百姓的“小情感”产生共鸣;文艺创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握时代脉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审美意蕴与精神滋养,实现“红色气质”与“中国气派”的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立足“两个结合”的实践基础,以回应现实问题的方式深化群众的价值认同。舆论场域既是社会情绪的集中反映,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两个结合”所内蕴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不仅要求意识形态建设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情感凝聚,即要善于倾听群众声音,精准研判舆论走向,及时澄清热点事件、化解情绪波动,守住主流舆论阵地;更要意识形态建设浸润着传统文化中“惠民利民”的价值追求,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制度信任与政治认同,进而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四) 以“两个结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凝聚力

“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25],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两个结合”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明确的精神定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26]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根基,更是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思想源泉。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27],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坚持“两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政治定力,强化了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为意识形态“举旗定向、凝心聚力”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另一方面,以科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结合”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科学理论是理想信念坚定的基础。习近平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28]“两个结合”正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构筑起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坐标。对此,习近平强调,要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29]。唯有如此,才能在思想的深度统一中,引领全社会形成稳固的制度信念与思想认同。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还体现于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取向的弘扬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30]。“两个结合”提供了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时代内涵与真理力量,使其在多元思潮激荡中保持引领作用;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民族共鸣。通过“两个结合”,抽象的价值理念得以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情感认同,进而将全社会的意志凝聚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之下,真正发挥出意识形态“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2] [7] [1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人民日报, 2023-06-03 (01).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1-112.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97.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7-02 (02).
- [6] [1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435.
- [8] [23] [2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 [9]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 (01).
- [11] [15]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 66, 323.
- [12]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6.
- [14]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2-02-08 (01).
- [16] [2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03, 503.
- [18] [20] [2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7, 30, 21-22.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 [2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9-11-06 (01).
- [2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11.
-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213.
- [25]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2-10-31 (01).
- [3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91.

责任编辑: 张嘉瑶

内涵·特征·路径：新时代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三维审视

杨 勇 纪柏伦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协商民主不仅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内涵维度，基于对“西式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辨识，可以勘定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本质内涵。从特征维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鲜明特征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从路径维度，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可从完善协商体系、提升协商能力、培育协商文化、发展网络协商、运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综合施策和重点突破。

关键词：协商民主 党的领导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6) 02-0017-06

一、问题的提出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学术性与实践性并行的概念，中西学者对它有着多重解释。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是平等主体通过理性商谈形成集体决策的过程^[1]。有学者强调它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对话建构共识，生成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公共决策^[2]。也有学者重申它是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即成员通过公共协商行使支配权的团体组织，或为政治理性讨论创设基础空间的政府形

态^[3]。尽管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的定义存在差异，但都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主要特征，如多元、合法、公开、平等、参与、理性等^[4]。相较于西式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5]。

新时代协商民主在渠道、制度和机制建设等方面不断完善，但协商民主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提升协商民主的实效，培育协商文化，使协商理念深入人心。互联网、人

收稿日期：2026-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内在关系研究”（21&ZD013）阶段性成果；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广西大学研究中心项目“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研究”（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勇，男，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广西大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纪柏伦，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广西大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协商民主。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推进网络协商民主的建设,通过加强网络治理水平、强化舆论引导、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等途径推动网络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6]。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协商民主,需要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制度、技术保障^[7],面向社会培养智能化的协商能力与协商文化^[8]。

综上,西式协商民主理论聚焦于理性决策与公共治理,指向公开、平等、参与等核心价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通过构建协商民主体系、加强协商民主能力、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拓展了协商民主参与维度,为探索和优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二、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内涵勘定

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属性特征与发展路径,关键在于完整透视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从“西式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及“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三个核心概念出发,从历史进程、实践形式、价值取向等维度综合对比,可全面厘清协商民主的内涵意蕴。

(一) 西式协商民主的内涵检视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该概念亦称为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或商谈民主。西方对于协商民主内涵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米勒等学者将协商民主视作一种决策方式,瓦拉德兹等学者将协商民主视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科恩和库克等学者则将协商民主看作一种社团或政府形式。

西式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家制度协商民主,指在国家机构正式制度中的精英主义协商民主形式,如政党协商制度模式;二是公民论坛协商民主,指由普通公民发起、社会大众参与的民主协商形式,如协商日、

协商民意测验等;三是公共领域协商民主,指关注宏观议题的协商民主形式,如美国公民权利运动、欧洲一体化运动。

西方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主流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至上。自由主义民主固守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诉求与协商民主预设的集体利益优先的逻辑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原生性冲突。

(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审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渠道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10]。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议题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分配和人民政协的选择产生,主要形式是举行座谈会或会议。

(三)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内涵界说

“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新时代协商民主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即推动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发展和“制度化”发展。

1.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发展。协商民主的“广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商主体的覆盖范围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既覆盖了人大、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等组织,还包括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二是协商内容的覆盖领域广。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地方政府听证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协商的内容覆盖了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协商民主的“多层”指的是其纵向的布局层级多，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各个层级都要用制度形式保障协商民主实践的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层级涵盖了国家、地方、基层三个层面，实现了各个社会层级的广泛参与；二是协商的形式不局限于政协协商，还采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形式。

2.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安排，确保协商民主按照规定的程序、渠道、形式进行，从而构建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协商民主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有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三重意涵。协商民主的法治化是指将协商制度成果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规范和指导协商活动；协商民主的规范化要求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遵循既定的规则，通过合法的渠道，并受到参与行为的程序约束；协商民主的程序化指对协商民主的参与过程作出明确具体、合理合法、有序完整的制度安排。

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鲜明特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1]，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征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领导，需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实际条件出发，“贯彻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一本质要求”^[12]。就此而言，全面性、系统性与整体性是理解和坚持党对协商民主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

1. 党对协商民主领导的全面性。党的领导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性要素，党对协商民主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党的领导在范围上覆盖协商民主活动的全领域、各环节，在内容上包括协商民主的各个方面，在过程上覆盖协商民主的全过程。一是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必须贯彻全面覆盖的原则。二是各级党委组织必须切实履行对协商民主工作的全面领导职责。三是必须系统推进协商民主实践中党的全面建设，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贯穿始终，并持续深化制度建设的根本保障作用。

2. 党对协商民主领导的系统性。党的领导

的系统性，指党的领导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各个要素和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集成性要素，党对协商民主领导的系统性，既体现在党对协商组织的组织领导是上下贯通、组织有力的，也体现在党对协商民主的制度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是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在整体性与全局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确保领导体系的系统化运行。作为系统工程，党的全面领导只有实现整体性与全局性，才能系统完备。二是党的领导要自觉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论，统筹把握协商民主实践中不同领域、方式、主体间的关系；需要充分考虑协商民主各项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三是党的领导要立足全局抓大事。要精准把握协商民主发展的关键，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实现制度设计的系统聚合、实施过程的动态耦合、治理效能的价值融合。

3. 党对协商民主领导的整体性。党的领导

的整体性，指党的领导所包含的各要素、各组成部分是有机统一的，党的领导贯彻在协商民主的全过程，领导功能发挥完整。整体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总体性要素，党的领导的整体性既体现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与其贯彻行动是统一的整体，又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是统一的整体。一是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协商工作都要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衔接起来，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

具体的工作中、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二是要构建协商民主领域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的整体化制度体系。要立足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规划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全域覆盖方案;打造贯通宏观微观、协调当前长远的立体化制度框架,实现党对协商民主全面领导的制度设计从体系构建到效能转化的有机统一。

(二) 人民当家作主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1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设的独特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人民民主。

1.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内在依据。“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1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人民性正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秉承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协商成效的根本标准。

2.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利益格局逐步调整,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高涨。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将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协商民主进入发展新阶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功能互补,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持续性和完整性,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动力。

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优化路径

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深度激活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创新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一) 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构建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就是要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格局。需要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机制;健全保障协商民主制度的法律法规;解决协商民主机制中的联动性问题。

1.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就是要衔接协商民主内部各程序,提高协商民主的效率。具体而言,需要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分类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要依据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原则,制定协商计划、组织协商实践^[15]。

2.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则是健全与民主协商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协商民主制度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2022年6月颁布的《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对政治协商的原则、对象、内容及保障等做了详细规定,为协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对于协商民主工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6]。

3.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关键在于增强协商民主体系内部的联动性,促进多层协商渠道发挥作用。《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强调,要拓展协商的场景,丰富协商的形式,并确保各方主体充分参与协商。特别是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增强基层协商与国家、地方层面协商的联动,确保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实施。

(二) 切实提升协商民主能力

协商参与主体的能力素养直接关系民主协商的实践效能与成果质量。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协商主体能力短板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增强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及社会组织

等多元主体的协商民主能力，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1. 强化协商民主意识是前提。协商能力建设应以强化协商民主意识为先导，将协商理念全面融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各维度；规范协商民主制度机制是根本，需要系统提炼协商民主实践中形成的创新举措与典型经验，通过制度固化和机制创新构建起现代化履职制度；确保协商质量是关键，既要构建开放包容的协商格局，还要实现协商效能向治理效能的实质性转变。

2. 提升协商民主能力是核心。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需激活其政治参与动能，通过完善政协委员履职保障机制，优化政策咨询制度环境，支持其围绕民生关切与社会热点问题建言；各级党政机关要认真对待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报告和建议；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各级组织建设。

3.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重点。社会组织是社会中的基本要素，是连接政府、社会和公民的桥梁，是公民表达意愿和诉求的组织依靠。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一方面需要从法治化、规范化维度健全社会组织发展生态，引导其依法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需要以社会组织为协商主体，拓宽各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协商平台，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急、盼、难”问题。

（三）积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在各领域全面推行协商民主实践^[17]。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增强协商民主观念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 承认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增加，进而导致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协商民主的目的在于调和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首先承认社会中分歧与冲突的普遍存在，才能开展理性客观的民主协商。

2. 积极培育公民意识和参与型政治文化。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民主实践，构成了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基石。而现代公民民主素养的提升与协商能力的培养，则是协商民主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公民通过有效参与政治生活，逐步培养民主和法治观念，提高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养成协商、合作、宽容的民主精神，最终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发展。

3. 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人民民主。因此，需要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畅通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尤其是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与渠道的建设；通过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引导公民有组织、有秩序地表达意见、诉求。

（四）有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通过重塑协商主体参与机制，推动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进而催生了网络化协商民主。这一新型民主形态既是协商民主与网络的结合，也是协商民主应对技术变革的探索。

1.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政府作为公共信息的权威发布主体，依托政务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移动终端应用等媒体，构建重大公共政策的预公开机制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信息的披露机制，通过信息供给侧改革系统性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网络协商民主的良性运转与信息传播风险的有效消解。

2. 搭建网络协商平台。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构建常态化交流机制。对于事关重大公共利益或民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须组织在线听证咨询活动，广泛征集社会公众意见。相关部门要及时跟踪网络舆论，鼓励理性表达，引导网民相互尊重包容，防范群体非理性行为。对于涉及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等问题，要予以重点关注并优先处置。

3. 强化网络监管引导。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舆论呈现自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匿名性、难控性等特点。各级党政机关不仅要加强对网络的规范和监管，为公民进行民主协商、政治

参与提供便捷的信息支持,还需要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引导舆论,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导向作用。

(五) 人工智能赋能协商民主

随着 ChatGPT、DeepSeek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协商民主正加速向“智能协商”新阶段演进。智能协商(Intelligent Deliberation)即通过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科学融入民主协商全流程,重构协商机制与决策程序,在显著降低协商成本、提升决策效能的同时,有效强化共识凝聚与公共政策产出质量^[18]。人工智能赋能协商民主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 运用人工智能促进政治数据的有效利用。政协系统深度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重大议题分析,可充分发挥智能算法在数据挖掘与信息识别方面的独特优势,增强协商实践的科学性。面对数字化治理转型的未来图景和日益复杂的政治社会系统挑战,不但要深化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层级,而且要持续积累高价值政治数据资源,为智能分析提供基础原料。

2. 运用人工智能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质效。政协系统通过人工智能优化智库运作机制,借助科学协商显著提升公共决策质量。新型智库建设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基本要义正是推动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面对智能革命浪潮,未来协商民主发展将聚焦两大前沿领域:智库对人工智能技术本体的系统性研究,以及运用智能工具革新政策研究范式,形成技术驱动—理论创新—决策优化的良性循环。

3. 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协商模式的智能转型。政协系统对协商全流程实施智能化建设,重构意见表达、政策推演与观点交互机制,能显著优化共识达成的效能。协商民主的核心功能,即对政治表达的统计分析与智能处理,伴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将在意见采集、政策模拟等环节释放更大的价值。由此,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反馈体系,成为提升协商民主精准治理效能的新方向。

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完善协商体系、提升协商能力、培育协商文化、发展网络协商、运用人工智能以整体推进和合力驱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方能更好体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参考文献】

- [1] MILLER D. 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 new perspective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1.
- [2] 乔治·M. 瓦拉德兹,何莉. 协商民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3): 35-43.
- [3] COHEN J.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67.
- [4] 陈家刚.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5.
- [5] 尹中卿. 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J]. 求是, 2003(14): 44-46.
- [6] 张爱军, 张媛. 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困境及其化解[J]. 江淮论坛, 2019(4): 63-69+193.
- [7] [18] 杜欢. 人工智能时代的协商民主: 优势、前景与问题[J]. 学习与探索, 2017(12): 69-77.
- [8] 郭一宁. 数智协商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 探索, 2023(1): 66-77.
- [9] [10]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02-10(01).
- [11] [15] [1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09-21(02).
- [1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9-11-06(0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的民主[N]. 人民日报, 2021-12-05(05).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8.
- [16]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 2022-06-21(01).

责任编辑: 程凯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内涵要义及其优化路径

刘蕊

(渭南市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理论、实践和文化四重逻辑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至上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合为价值取向、以协商民主与政治监督协同为运行机制、以合作共事为政党关系特征、以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践效能;从理论创新、制度完善、自身建设、实践探索、国际传播五个方面着手,可以协同推进其优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生成逻辑 内涵要义 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6) 02-0023-06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根基、实践特质和制度价值。该制度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新形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深入研究其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产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文化结晶,是历史、理论、实践、文化四重逻辑协同作用的结果。

(一) 历史逻辑: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近代中国先进力量曾多次尝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制尝试、革命派的议会多党制实践均以失败告终,暴露出西方政党制度与中国

收稿日期:2026-02-15

作者简介:刘蕊,女,渭南市社会主义学院校刊编辑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型政党制度。

国情的“水土不服”^[2]。随后国民党建立的一党专制统治,背离人民意愿、无视社会诉求,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最终失去民心。历史反复证明,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脱离中国实际的政治模式难以承载民族复兴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立足国情探索符合实际的政党制度。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为政党合作奠定早期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实践探索。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启了协商建国的新纪元。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政治共识,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领导核心地位,并联合其他进步力量共同实现革命使命^[4]。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结合具体国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将统一战线作为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模式,奠定多党合作理论基础^[5]。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多党合作理论,明确民主党派“参政党”性

质定位,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为多党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科学概念,从利益代表、职能作用、实践效果三个维度阐释其“三新”特色与优势,提出加强参政党建设的“四新”“三好”要求和提升“五种能力”的新标准,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以协商民主为纽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6]。

(三) 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扎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土壤,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携手并肩,民主党派在宣传民主思想、支持革命斗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党形成生死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为革命胜利凝聚强大合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界别特色,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等领域建言献策,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作出重要贡献,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制度载体。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围绕改革开放和民生保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制度成为助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度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课题,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价值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围绕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战略开展联合调研、共同建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中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该制度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展现出强大的实践适应性和生命力。

(四) 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深厚文化土壤，“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等传统政治智慧，为制度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文化滋养^[7]。

“天下为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相结合，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新型政党制度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摒弃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是“天下为公”理念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和而不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处理关系的重要智慧，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基础上实现“和”，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保持“不同”，既保证政党间团结协作，又促进政治生活民主活跃。“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使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和意见，吸收借鉴国内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要义，其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价值取向是人民至上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运行机制是协商民主与政治监督的协同运行，鲜明特征是合作共事的政党关系，实践效能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并开辟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各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了制度的完整体系。

(一) 核心要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义，是该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

度的根本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并非自封，而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已明确载入宪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准则。

党的领导体现为政治方向引领、政策共识凝聚和治理资源统筹。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制定符合国家发展实际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方针，确保国家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制度体系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自觉接受党的政治领导，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与党形成“执政”与“参政”的良性互动。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民主协商、平等合作原则，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益，支持其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8]。

(二) 价值取向：坚持人民至上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

人民至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被具象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新型政党制度摒弃西方政党制度为争夺选票迎合短期利益、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将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度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类协商形式始终围绕民生问题展开，各民主党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就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等民生热点建言献策。国家制定重大政策时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确保政策符合人民意愿、回应人民期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实现形式,实现了人民至上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覆盖,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协商民主体系,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提供制度平台。这种制度设计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拓展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统一^[9]。

(三) 运行机制:协商民主与政治监督的协同运行

协商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运行机制,政治监督是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二者协同发力、有机统一,构成了制度科学高效的运行体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法规文件,构建了涵盖议题设置、程序规范、成果反馈的协商民主动态管理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常态化的协商机制。

政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形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中共中央每年围绕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民生重点问题,以专题协商会、座谈会等形式与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各民主党派凭借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深入调研,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通过全体会议、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形式组织广泛协商,成为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同时,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各民主党派成员参与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基层实践,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的立体协商网络。

与西方政党制度中对抗性监督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民主监督是合作式、建设性、非对抗性的监督^[10]。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国家法律法规实施、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职情况开展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意见反馈和落实机

制,确保监督成果转化为政策改进和工作提升的实际举措。

(四) 鲜明特征:合作共事的政党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竞争对立、轮流执政的思维模式,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共事政党关系理念,这是制度最鲜明的特征^[11]。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并非相互对立、相互掣肘的关系,而是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的亲密友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合作共事的政党关系建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政治基础之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共识。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党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和自主权利,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民主党派自觉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

合作共事的政党关系体现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治理合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能够统筹协调治理资源、把握发展方向;各民主党派汇聚了各领域优秀人才,具有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在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成“执政党掌舵领航、参政党建言助力”的良好治理格局,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因党派竞争导致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弊端。

(五) 实践效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开辟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治理体系系统化、治理机制科学化、治理主体多元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平台^[12]。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共识凝聚和力量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减少政治内耗、凝聚社会合

力。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协商民主,充分倾听各方面意见和诉求,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凝聚最大共识,使制度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中展现出高效的动员力和执行力。同时,制度能够保障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推动国家发展战略长期实施。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为国家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能够持续推进中长期发展战略,各民主党派始终参与战略制定和实施监督,确保战略落地见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更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长期以来,西方将两党制、多党制定义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形成民主话语垄断。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固有模式,创造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政治新形态,摒弃了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对抗性逻辑,确立了合作、协商、共赢的政党关系新范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制度为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证明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在坚持根本原则和制度优势的基础上,从理论创新、制度完善、自身建设、实践探索、国际传播五个维度协同推进优化发展。

(一) 强化理论创新,夯实制度发展根基

理论创新是推动制度发展的核心先导,当前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仍存在阐释深度不足、话语体系建设滞后、应对新问题理论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一要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构建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结合制度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梳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实践经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深度融合。二要推动理论与时俱

进,回应新时代实践课题。针对数字化转型、新兴社会阶层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等新课题开展前瞻性研究,探索数字技术在政党协商、民主监督中的应用理论,及时将实践成果上升为理论成果。三要加强理论宣传教育,提升制度社会认知度。通过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等阵地加强对党员干部、民主党派成员的理论培训^[13],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公众宣传制度的内涵和实践成效,破除西方民主话语误导。

(二) 完善制度机制,提升制度运行效能

完善的制度机制是新型政党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一是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提升协商针对性和实效性。明确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制定协商议题产生、成果转化的全流程规范,建立协商成果转化评估机制,拓宽网络协商、远程协商等渠道,加强各类协商形式的衔接配合。二是深化民主监督机制,增强监督的专业性和建设性。制定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细则,明确监督内容、对象和方法,建立监督信息共享平台和民主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鼓励民主党派围绕重大政策落实等开展专项监督。三是优化参政议政机制,激发参政议政活力和创造力。建立参政议政选题协同机制,由党委、政府与民主党派共同确定重点选题^[14],完善调研保障机制和提案办理反馈机制,建立参政议政成果激励机制。

(三) 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参政党履职能力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履职能力直接影响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发挥,各民主党派需按照“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五种能力”^[15]。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政治立场。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常态化、制度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史、统一战线史和民主党派史学习教育。二是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组织基础。优化民主党派组织结构,注重吸收各领域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和新兴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提升参政议政水平。建立健全

民主党派成员培训体系^[16]，搭建履职平台，完善履职考核机制。四是加强作风和制度建设，提升规范化水平。弘扬求真务实、深入调研的工作作风，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四）深化实践探索，拓展制度应用场景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需要进一步深化实践探索，拓展制度应用场景。一要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扩大制度覆盖面。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搭建线上政治参与平台，推动群众诉求与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有效衔接。二要创新政党合作方式，提升合作实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跨领域、跨区域工作中的合作，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开展联合调研、联合建言，推动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三要丰富社会服务实践，彰显制度民生价值。引导各民主党派发挥界别优势，开展科技下乡、教育帮扶、医疗义诊等社会服务活动，建立社会服务品牌培育机制。四要探索跨区域合作实践，推动制度经验交流共享。鼓励各地区结合实际探索制度在地方治理中的实践模式，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五）加强国际传播，提升制度国际影响力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仍不够深入，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一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政党制度故事。深入研究国际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和传播规律，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语言阐释制度的核心理念、运行机制和实践价值，挖掘典型案例，制作多语种传播产品。二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分享中国政党制度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政党交流活动，举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论坛、研讨会，邀请外国政党、智库来华交流考察^[17]。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流合作。三要提升智库国际交流能力，增强理论传播专业性。支持国内高校、智库开展制度的国际研究，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培养兼具国际视

野和专业素养的国际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01).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126-128.
- [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289-290.
- [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8-30.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4-35.
- [6] [15]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5, 15.
- [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办公室, 2021: 6.
- [8] 习近平.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02).
- [9] 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2.
- [10] 吕志轩.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内生逻辑与创新优势 [J]. 山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6 (1): 83.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05.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16.
- [13] 中共中央统战部.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0: 28-30.
-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政协提案工作条例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1: 15-17.
- [16]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民主党派成员履职能力提升教程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1: 45-47.
- [17]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文集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2: 125-127.

责任编辑: 王晓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李娜萍¹ 王晓璘²

(1. 长安一中 陕西 西安 710100; 2.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新概念,全面系统地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内涵并探索发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理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从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独特优势、显著特征、实践路径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性探索,是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6) 02-0029-06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领域创造性地围绕“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论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在新时代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作出的时代考察和战略考量。它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和怎样才能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时代问题。当前,学界既有成果多聚焦于归纳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构建其内容体系,而对于这一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创新性贡献学界的挖掘深度仍显不足。

本文尝试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行深入剖析,旨在系统阐释该论述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以为相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一、继承创新: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新概念

任何知识体系的生成都是历史语境、现实诉求与思想传统、文化基因的交互形塑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有其孕育形成的理论渊源、文化沃土和历史依据,分析其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是全面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题中之义。

收稿日期: 2026-02-15

作者简介: 李娜萍,女,西安市长安第一中学思想政治教研组长,中教一级,研究方向:新型政党制度;王晓璘,女,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型政党制度。

（一）理论渊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理论以及政党和政党关系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石”^[1]。

一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欧洲革命实践，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初步形成同盟思想。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具体化这一思想，强调联合农民和资产阶级，但明确指出必须保持无产阶级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2]，以避免农民的组织松散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影响革命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关键创新：确立了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创造了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独特策略——既联合又斗争，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人民的自我规定”^[3]，国家制度仅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局限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列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形式，并强调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其创新在于，将“无产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紧密结合，并将民主的主体范围扩大到一切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强调了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阐明了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先锋队政党——共产党。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可以与其他进步政党或力量合作，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立性。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政权建设中，对多党合作的阶级基础和政治策略进行了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与中国

实践深度结合：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并在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形成了新型政党关系。

（二）文化溯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而且“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4]。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价值认同高度统一的文化基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源自《礼记·礼运》，孔子所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强调选贤任能、讲信修睦、老幼皆有所养。这一愿景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孕育出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爱国情怀。近代以来，它汇聚为救国救民的政治共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的价值观——坚持人民至上、崇尚民族大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从而在根本利益上实现政治理想的汇流与融合。

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西政治文明交流碰撞的智慧产物的基本前提。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又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政党和政党制度作为西方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产物，经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引入中国，使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新中国构建的基本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兼容并蓄，将外来文明成果与自身实践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形态。

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

体多元结构形成的基本依据。“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法，主张在承认事物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共识，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状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维于政党关系之中，形成了合作团结型的政党关系模式，构建起“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这一格局以一体多元为特征，既保证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又包容多元参与，实现了政党关系的和谐与效能统一。

（三）实践来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脉络，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壮阔历程。

该制度萌芽于近代民主革命时期。西方议会制在中国的实践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抗日和反独裁斗争中与民主党派并肩作战，1944年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通过“三三制”政权实践积累了群众基础，逐步形成制度构想。

协商建国阶段是制度框架形成的关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相关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制度体系持续巩固发展。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坚定多党合作理念，1956年中共八大确立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其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9年相关意见出台推动多党合作制度步入制度化轨道，1993年该制度被写入宪法，2000年后多项配套文件陆续出台，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发展进入快车道。2018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新型

政党制度”标识性概念；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将其纳入“十二个必须”核心要义；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一制度，其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政治保障。

二、开拓纳新：创造性地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内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新性理论概括与话语表达，是中国共党政党观的当代呈现和最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立足时代发展特点和社会进步诉求，聚焦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与显著特征，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独特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超越了传统政党囿于少数人的利益代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存在在此基础上由于社会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具体利益差别。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可以把其所联系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具体利益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平台等各种参政议政方式进行反映，同时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献计出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以平等协商、开放包容的理念支持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民主党派则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针政策制定等关键领域深度融入，建言献策。双方构建起良性的“协商式监督”关系，这种建设性监督旨在凝聚共

识、协同共进,形成了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进而充分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该制度将政治协商深度嵌入决策过程,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无序竞争和内耗。通过制度化协商凝聚智慧,既夯实了决策的民意与专业基础,又确保了政策切合实际,从而显著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充分证明了其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二) 显著特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也是多党合作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新型政党制度的前进方向才不会跑偏,制度效能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多党合作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派参政,都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了“为人民负责的政治共同体”^[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以轮流执政为形式,而是以合作、参与、协商为核心,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遵循“商量民主”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等制度化渠道,确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在讨论协商中凝聚共识。人民政协作为关键载体,通过规范化平台保障各民主党派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的权利,在凝聚共识与建言资政双向发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三、系统布新:创造性地探索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中,不仅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优势进行归纳阐释,更从方法论维度对新时代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进路进行梳理,创造性地构建起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点,以发挥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作用为着力点,以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支撑点的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路径。

(一)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7]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组织或者行政上的领导。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要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从领导内容、领导主体、领导方式等方面对加强党对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进行具体论述。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体现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各方面各环节,《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8]。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架构中,存在两个重要维度的明确界定:其一,领导主体的组织属性界定。新型政党制度下的领导实施主体为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党委部门并不直接行使领导权。其中,中共党委统战部作为职能部门,虽承担民主党派联络及党派工作开展的重要职责,但与民主党派之间并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受中共党委委托开展工作。其二,领导主体的决策机制界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领导工作遵循集体领导原则,强调决策的民主性与

科学性,通过集体智慧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相关工作,坚决避免个人专断决策,确保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运行与持续发展。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有在长期多党合作历程中积累探索出的民主协商、照顾利益、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率先垂范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以发挥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作用为着力点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于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9]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政治活动主体,能否发挥出参政党的作用和职能,直接关系到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加强参政党建设,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一是明确性质定位。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0],从理论上明确其政党性质;2021年进一步要求民主党派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11],明晰了新时代参政党的使命与追求。二是丰富建设内容。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将参政党建设从“三大建设”拓展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突出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地位,推动建设体系更趋完善。三是提升能力要求。2014年,习近平提出参政党需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四种能力”;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新增“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形成“五种能力”体系,适配新时代参政党职能拓展需求,为其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提供指引。

优化履职机制,展示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气象。民主党派职能与人民政协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一方面,民主党派基本职能

得到拓展深化,在传统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基础上,“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首次被明确纳入,进一步丰富民主党派职能体系,为多党合作注入新内涵。另一方面,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与履职重心获得全新阐释:首次系统明确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核心地位,突出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职的中心任务,这一论断为新时代政协工作锚定方向,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参政党职能发挥在制度保障与实践创新中稳步推进。首次以中办文件形式对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工作进行规范,并专门创设调研协商座谈会,推动民主党派中央重点考察调研成果的转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作出明确规范,同时,中办印发专项文件,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提供指引。在此背景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中央大力支持各民主党派聚焦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执行及国家中长期规划重要约束性指标等领域开展专项监督。自2016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积极响应,先后围绕脱贫攻坚、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民主监督,切实发挥民主党派监督效能,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力量。同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履职版图持续扩容。相关政策举措不断推动其在全新领域与空间发挥效能,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思想引领,在联系、团结、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方面凝聚社会力量,在对外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多维度拓展履职维度,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注入新动能。

(三) 以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支撑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新方案,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但是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动又丰富的实践,有关新型

政党制度的理论构建发展相对滞后。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12]如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更好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普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是进一步发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要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阐释，“最基本的就是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文化基因、价值功能、特色优势，从道理、学理和哲理上说清楚、讲明白”^[13]。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广阔场域中，系统性从道理、学理、哲理层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深度阐释的论著仍较为匮乏。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强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人才与学术支撑体系。一方面，应大力扩充研究队伍规模，整合党校（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以及高校等多元主体的科研力量，形成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格局；另一方面，聚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深入开展学理化研究，通过理论创新提炼核心概念、探索内在规律，系统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话语权，为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要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标识性概念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创新发展产物，但是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垄断局面，仅仅靠一个新概念远远不够，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任务艰巨，任重道远。应在学理层面持续深化理论创新研究，构建具有学理深度和时代特征的阐释体系；在实践层面强化人才梯队建设，培育政治素养过硬、理论功底扎

实的专业化队伍，夯实制度运行的组织基础；在传播层面实施立体化宣介策略，通过多媒介融合传播扩大制度影响力。通过系统性推进、全方位深化、多层次巩固、可持续拓展的发展路径，切实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政党制度理论框架和话语表达体系。

【参考文献】

- [1] 徐峰，高国升. 正道明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142.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 [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
- [4] [10]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29-230，11.
-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3.
- [6] [8] 臧秀玲，贾晓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与路径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
- [7]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N]. 人民日报，2023-01-17（0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5.
- [11]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N]. 人民日报，2021-02-02（01）.
-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2021-06-02（01）.
- [13] 张献生. 关于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几个问题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6）：5.

责任编辑：章雅昭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情感建构机制与实践路径

梁健晟¹ 王佳桐²

(1.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42; 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港澳与内地的经济社会整合进入新阶段。受跨文化差异、教育区隔等多重因素影响, 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仍面临剧场假象、情感钝化、符号式微、实践疏离等现实挑战。以国家认同教育培养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感, 关乎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基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 可聚焦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本体、过程、实践三个维度, 通过强化情感体验、深化符号浸润、培育情感认同及拓展日常互动, 提升港澳青年的认知与情感连贯性,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互通共融、促进区域认同建设提供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港澳青年 国家认同 “互动仪式链”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6) 02-0035-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 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港澳青年发展得好, 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 国家就会发展得好。”^[1]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完善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同推进, 区域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在此进程中, 全球文化交融也在不断向纵深演进, 使得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培育面临新的时代课题。美国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 将情感与互动仪式作为社会认同构建的重要手段, 为研究推动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崭新视角。本研究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 拟聚焦港澳青年群体, 以情感联结与互动仪式为切入点, 剖析共鸣与互动的核心要素, 构建情境适配的策略框架, 为增强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与提升其社会参与感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收稿日期: 2026-02-15

基金项目: 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枫桥经验’嵌入高校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风险防范及修复路径研究”(25JDSZ3079)阶段性成果; 2024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短视频传播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优化路径研究——以‘抖音’APP为例”(2024GXJK379)阶段性成果;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课题“广州红色空间重塑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在地优化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视角”(2025GZGJ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健晟, 男,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学生发展与教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王佳桐, 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一、本体论维度：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理论建构与内在逻辑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本体论叙事是秉持系统思维，立足“五个认同”，深入阐释该理论如何通过沉浸式互动生成情感能量，从而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青年的具体认知与情感归属。

（一）国家认同的生成逻辑及其建构要素

国家认同的形塑机制蕴含多维度的建构逻辑，在历史演进、跨文化实践与制度创新的三维框架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建构始终与世界文明的互鉴进程保持动态平衡。

从纵向历史维度考察，古人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从屈原“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捐躯之志，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临终牵挂，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救亡实践，历代仁人志士以生命践行了对国家的忠诚。近代以来，梁启超奠定了国家思想研究的基石，其理念经约瑟夫·列文森系统阐释后，成为解析中国思想转型的关键。现代学者贺金瑞进一步指出，国家认同是以文明传承为纽带，将民族意识与国家命运自觉联结，形成维护主权、增进利益的主体性观念^[2]。这一过程，实质上完成了从传统忠君思想向现代公民意识的历史性跨越。

从横向建构维度看，国家认同作为民族意识的核心要素，通过整合族群、文化与制度三重维度，构建起贯通古今的价值谱系。其一，族群认同是基础维度，依托血缘、语言、习俗等具象要素凝聚归属感。正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言，华夏诸族“错居交通”，在去小异、存大同中渐次融合。这种基于生物文化特征的初级认同，为民族共同体铸牢情感根基。其二，文化认同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认知跃迁，通过共享的历史叙事、价值观念和艺术表达构建文化归属感。其三，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整合的高级形态，通过制度规范将多元要素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形成对国家主权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结合，既确认了历史渊源，又通过制度完成了法理确证。

（二）“互动仪式链”理论框架下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逻辑认知

在互动仪式研究的学术谱系中，戈夫曼在涂尔干关于社会仪式的研究基础上，引入了“互动仪式”概念，揭示了微观互动中象征符号与程序规范的运作机制。柯林斯在此基础之上，整合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拟剧论、伯格等人的社会建构论，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该理论认为，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体互动，均由一系列紧密相连的仪式构成。其核心包含四个要素：身体在场、屏障设定、焦点集中、情感连带，通过循环互动积累情感能量、促进群体团结，这为解析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

其一，“身体在场”作为仪式的基础，构建了人际互动的微观情境，要求个体在物理空间聚集，通过面对面交流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与情感的直接共鸣。其二，“屏障设定”确保了互动仪式的专注性与纯粹性。通过设置明确的参与边界，将仪式内部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区隔，参与者能够更加专注于仪式本身，进而深化对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仪式施行者在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与内容中，将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融入其中，使青年们在专注而纯粹的仪式氛围中逐渐内化这些价值观念，自觉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其三，“焦点集中”作为互动仪式中的关键步骤，要求参与者在共同的目标或主题下，通过讨论、分享与反思等协作方式聚焦焦点、达成共识。在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情境中，可围绕国家历史文化等核心议题展开互动，引导青年深入思考并内化这些价值观念，自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四，“情感连带”作为互动仪式的精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参与社会互动与获得成员身份的渴求，带有明显的社会取向。对个体而言，情感能量的追求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行为，但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促成群体的团结”^[3]，揭示了情感能量的积累既是自我满足的过程，更是维系群体团结的符号资本。

“互动仪式链”理论揭示的情感凝聚、符号沉淀与身份形塑的三阶段过程，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族群记忆唤醒、文化价值内化及制度认同深化的递进逻辑具有学理层面的对应性。港澳青年

通过跨境学术交流、文化工坊等亲身实践，在共享体验中完成符号传递。这种微观互动，为探索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国家认同培育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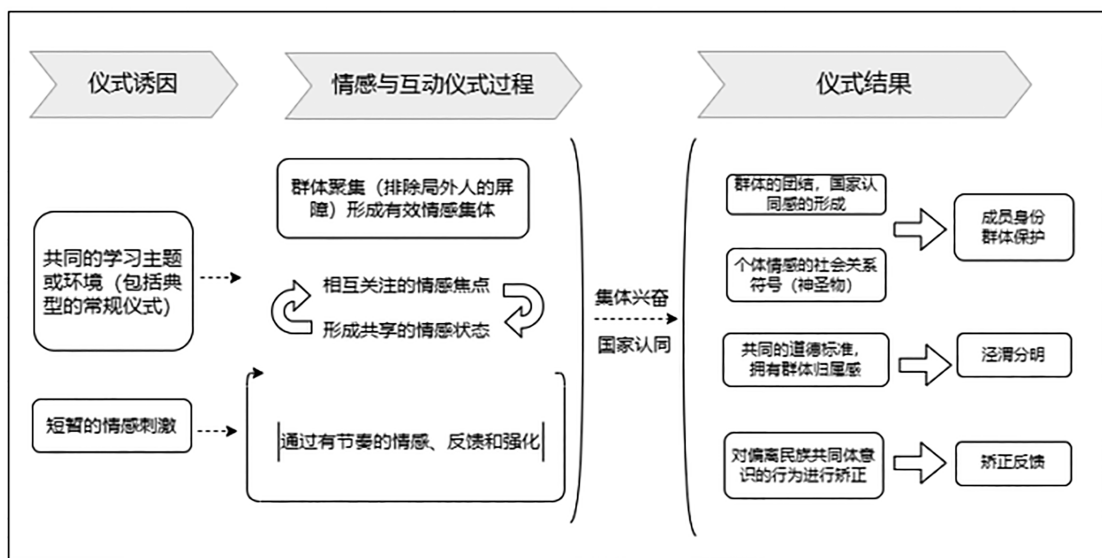


图1 情感与“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图

二、过程论维度：湾区融合进程中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现状分析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主张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建构和完善自身的认知结构，这一视角恰能解释港澳青年在历史、情感及价值认同上出现的认知断层现象，为破解文化认同疏离、重塑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点。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下的港澳青年身份认同

随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交融的日益深入，港澳青年在文化认同、身份认知、政治参与意识及情感归属方面呈现复杂多元特性，这些特性不仅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也映射出全球化时代个体身份构建的动态过程。

1. 港澳青年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构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多元文化基底。一方面，港澳青年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节日、文化符号具有深厚的情感。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中秋佳节的赏月团圆、重阳节的返乡祭祖，都是他们文化认同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历史在港澳社会植入了深层的“思

想木马”。“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结果是把殖民主义的离开对于土著们意味着回到野蛮、堕落、兽性化这一思想插入土著们的头脑里。”^[4]香港殖民统治解体后，其文化编码仍以制度惯性的方式运作，官方行政和高校教材仍沿用英文，而市井百姓却讲着粤语，这种“上层英式、底层本土”的割裂，成了殖民遗留与在地文化共生的独特写照。

2. 港澳青年身份认知的多元特性，体现了其身份构建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港澳青年既认同自己是享受国家发展红利的中国公民，也对“港人”“澳人”身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港澳地区与内地的差异逐渐显现，港澳青年的身份认知也出现分化。一部分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参与内地交流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来强化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另一部分青年则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走向极端化。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参与暴乱被拘捕的7700多人中，学生占了四成，当中逾半是大学生”^[5]，这些群体陷入了“虚拟爱国话语”与身份焦虑的认知窠臼。

3. 港澳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成为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青春力量。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下,“Z世代”港澳青年拥有了更加便捷和多元的表达渠道,他们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关切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6]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到《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一系列顶层设计既为港澳地区繁荣稳定提供了强力支持,也为港澳青年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法治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自2008年澳门青联开展“青年议政能力训练计划”以来,至2024年5月已培养近1500名关心国家民族发展、服务社会的精英,展现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从政治关切到实践参与的转变。

4. 港澳青年情感归属和困惑并存,体现出其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与探索。从情感社会学视角出发,个人日常交往中的情感累积与重构,有助于解释港澳青年身份焦虑的“双重生”逻辑。一方面,“情感能量具有社会认知取向,能够产生组织定向的文化情感认同”^[7],情感驱动的文化认同促使许多港澳青年对本土文化保持深厚依恋,并通过传承粤语、参与舞火龙等节庆实践维系乡愁,这些情感投入也成为他们投身大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面对更广泛的区域融合与外部环境变化,港澳青年归属感和文化自觉间张力明显。他们既渴望抓住发展机遇、扩大公共参与空间,又担心融入过程中失去自我特色,这种矛盾导致其在身份、价值与情感维度上国家认同的摇摆。

(二) 港澳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结构性困境

国家认同是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及身份确认,港澳青年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关键主体,其认同建构关乎区域治理效能。“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互动仪式通过空间具身性、群体排他性、符号聚焦性与情感转化性等要素,在生成情感能量与符号资本的同时建构群体认同的

动力学机制,其为解析港澳青年在历史传统、文化认知与社会转型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认同困境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1. 剧场假象:港澳青年身体在场不足,互动效果受限。“互动仪式和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8],身体的共同在场是互动仪式的基础,促成了个体间的物理接近,为情感的交流与认同的构建提供可能。然而,在港澳地区,随着网络技术的颠覆性变革,青年生活交流方式逐渐从物理性的二维空间向虚拟性的三维空间嬗变,导致身体在场交流日益匮乏,形成所谓的“剧场假象”。港澳青年使用Instagram、Facebook等进行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形成了虚拟社交圈层。部分学校在国庆节等重要节日通过网络直播形式组织升旗仪式,但“情感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身体反应而相互增进”^[9]的,网络围观使得参与者难以通过屏幕捕捉队列的行进节奏,也无法感知国旗升起时的仪式感,集体情感共鸣和爱国情感激发效果大打折扣。

2. 情感钝化:港澳青年信任感较弱,人文关怀缺乏。柯林斯指出,持续的情感能量交换需要建立在共同历史记忆与集体符号认同的基础之上。情感自信作为港澳青年完成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一环,正如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中论述社会共同体时指出的:“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10]个体的自信是共同体再生的条件。港澳青年必须在对民族历史的理解与对当代发展机会的体验中重建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一国两制”不仅是制度安排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日常教育、文化交流与公共纪念等互动机制,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民心所向。

3. 符号式微:思政工作靶向不准,合力凝聚不足。港澳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在仪式性符号生产维度呈现双重困境。一是历史维度出现集体记忆的断裂。抗战等重要历史叙事被碎片化处理,“一二·九运动”等抗争符号只剩下零散的日期和名词,难以串联成完整的历史脉络,妨碍青年

形成连贯的历史认知。二是媒介维度传播方式不断变化。“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11],当公共话语逐渐娱乐化,社交平台上由算法分割的信息生态加剧这一趋势后,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就陷入“能指与所指脱节”的困境,难以触发共鸣。

4. 实践疏离:港澳青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践亟待具体化。文化认同不仅需要理论认知,更依赖于实践层面的持续强化与内化。然而,在港澳地区,青年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呈现实践疏离状态。在节日仪式方面,传统节庆的符号实践与意义生产发生系统性脱节。春节“行花街”、端午划龙舟等本应承载集体记忆的仪式活动,在消费主义裹挟下降格为社交景观与商业展演。在文化传承方面,非遗项目的代际传递遭遇价值传导阻滞。粤剧、舞火龙等具身技艺,在数字化语境中被异化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青年仅通过屏幕围观,而非亲身参与,导致代际传承退化为机械的符号复制,难以触及文化认同的深层内核。

三、实践论维度:港澳青年国家认同培育的协同机制构建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野中,国家认同的构筑与强化并非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体现在实践场域中的不断磨砺与持续精进。“互动仪式链”理论从具身情感、符号浸润、情感认同及互动实践的四维视角,为有效促进港澳青年在符号互动中生成“我们感”的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 具身情感:民族情感感知情境具体化,共筑民族身份心灵家园

具身情感作为一种将身体感知与情感体验深度融合的情感体验,强调在特定的情境与氛围中,通过身体的直接参与和情感的深度体验,将抽象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民族情感。柯林斯指出,“由群体团结的体验所产生的情感能量是社会互动中的首要益处”^[12],并通过“情感

能量(EE)”的积累与再生产来强化群体归属感。在港澳地区,这一理论为增强青年国家认同提供了实践可能。

其一,具身情感的实践路径在于构建情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根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应“充分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或纪念活动和群众性主题教育”^[13],使抽象的国家叙事在周期性的仪式操演下转化为具身情感体验。香港特区政府推动的中小学升旗仪式,本质上完成了柯林斯所谓的“互动仪式市场”中的“微观节奏”精准协同。全校师生通过肃立形成的身体共在、注视国旗形成的焦点同步、齐唱国歌形成的节奏共振完成了情感能量的再生产,使港澳青年获得“主动行动、投入热情”的驱动力。其二,具身情感的深化需要构建持续的情感能量再生产机制。柯林斯强调个体在互动仪式中投入各种成本,最终目的都是获得最高的“情感能量回报”,在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归属感中实现心理融合。在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联合承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中,港澳青年通过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及宣传推广,将国家认同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身体验,亲身感受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更加深刻认识到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使命担当。

(二) 符号浸润: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产生民族历史记忆共鸣

习近平强调:“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4]通过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港澳青年能够在文化符号的编码、译码和存储濡化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产生强烈的民族历史记忆共鸣。

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5]历史教育不仅能够使学生深入了解民族发展的脉络,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践中,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历史文化展演、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方式,让青年在参

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香港中央图书馆在2021年举办“光影记忆百年风华——《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展现在港澳青年面前。另一方面，“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16]，数字技术在符号浸润中的应用为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借助VR/AR等沉浸式技术，港澳青年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回顾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程。如通过虚拟导览了解深港、穗港等城市群产业协同，或在数字化场景中体验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与通行如何改变区域联通，助力其把抽象叙事转为可感知的事件记忆，增强情感共鸣。在符号传播方面，TikTok等短视频和直播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与互动功能，把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广东省博物馆的专题展等内容，转化为易于参与的微叙事与互动事件，青年在观看、评论、参与话题中积累情感能量，把零散记忆与日常经验连结成共享叙事。

（三）情感认同：激发民族情感能量，深化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心理基石，是连接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的情感纽带。通过精心设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不仅能够激发港澳青年的民族情感能量，更能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7]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秉持着“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思想，这种文化基因深刻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谱系。一方面，应以历史文化为纽带，通过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发掘民族文化中的共同体元素，萃取民族团结与交融的共同智慧。广西的“三月三”源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其融合壮、瑶、苗、毛南等十二个世居民族的节庆实践，生动诠释着“声教讫于四海”的文化包容性。在壮族文化中，“三月三”包含了祭祀祖先、对歌择偶、戏曲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24年广西“三月三”系列

活动走进港澳，通过《山歌敬亲人》、民族乐器演奏、人偶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展演，让港澳青年直观感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影视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当代载体，通过符号再生产机制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化转译。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实施进程中，港澳青年民族认同的形塑机制呈现出新的文化表征。以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该作品通过解构传统神话的二元叙事框架，创新性构建了“魔丸”与“灵珠”的符号张力系统，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体性建构为当代青年突破身份困境提供了文化解码路径。

（四）互动实践：凝聚符号互动集体情感，促进港澳青年共同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认知主体在具体实践中完成对世界的理解与重塑，该理论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支点。将互动实践作为教育路径，核心在于把抽象的价值符号转化为可参与的、具身化的情境。通过仪式化的符号互动、共同完成的项目与日常性的协作活动，营造出含有共同文化元素的实践场域，使青年群体在情境化参与中完成情感和行为的认知图式建构。

一方面，沉浸式文化体验对认知重塑效用明显，可以通过开展参访革命遗址、民族博物馆等符号互动，进行内地与港澳师生交流等集体行动，在富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中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的有机融合。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港澳青年赴内地的“同根同心”及“同行万里”计划研学联动，通过参访红色教育基地、内地姊妹学校学术协作等方式，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港澳青年通过“故宫实习计划”参与文物修复、古籍整理、数字化监测等具身化实践，在“指尖触碰历史”中实现从“过客”到“故宫人”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增强实践体验与责任感。应利用港澳青年交流中心、湾区九市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助推港澳青年融

入内地城市发展。“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作为协同创新方面的典范实例，突破了传统校企合作的物理边界，通过政策端建立跨境知识产权仲裁机制，资本端设立规模达5亿元的梦工场组建基金，服务端开发大湾区青年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成功构建融政策、资本、服务于一体的跨境创新创业生态。

结语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培育港澳青年的家国情怀已成为代际对话的桥梁和区域共融的纽带。正如奥古斯特·孔德所言，“感情是人类的灵魂、行为的动力。推动力总是来自感情，才智永远只是一个指挥手段或控制手段”^[18]，这一论断揭示了情感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能仅靠理性说教，更需以情感共鸣为突破口，引导其在互动交流中读懂祖国历史、深植文化根脉。青年学子当守正创新、奋发有为，通过深化湾区交流合作凝聚民族合力，共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11-13 (02).
- [2] 贺金瑞, 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5-12.
- [3] 王鹏, 林聚任. 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 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 [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6 (1): 152-157.

- [4] 弗朗兹·法农. 全世界受苦的人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43.

[5] 当青年被绑上暴力战车: 香港修例风波回望之二 [N]. 经济日报, 2020-05-09 (02).

[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7] 诸葛达维. 游戏社群情感团结和文化认同的动力机制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2): 102-108.

[8] [9] [12]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译者前言 iv, 94, 207.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7.

[11]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46.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 (2019-11-11) [2026-03-1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11/t20191113_407983.html.

[14]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02).

[15] 梁启超. 新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91.

[16]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46.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

[18] 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67-68.

责任编辑: 刘悦

新形势下加快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制度机制研究

刘 利

(西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密切联系界别群众是政协委员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履行委员职责的重要方式。新形势下，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政协委员在通过委员履职、岗位工作、行业交流、专项民主监督等方式联系界别群众的过程中，亦存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有待加强、能力有待提升、界别设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有待增强、联系渠道和平台有待拓展等问题。各级政协组织要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创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渠道、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完善委员遴选机制、健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履职考评机制等方面，不断推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持续提升政协制度效能。

关键词：新形势下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制度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6) 02-0042-06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协委员需密切联系服务界别群众。新形势下加快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既是发挥政协委员桥梁纽带作用的根本保障和人民政协团结各界群众的有效依托，也是推进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核心课题，更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要求，其作为新形势下政协工作亟须创新完善的关键环节，对于推动基层协商、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提升协商互动的广度深度频度效度，以及广泛凝聚社会共

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形势下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发展现状

新形势下，随着顶层设计的完善、渠道平台的创新、技术工具的赋能、界别群众的积极参与等，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在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增强社会治理协同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机制有待加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能力有待提升、联系

收稿日期：2026-02-15

基金项目：202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课题“新形势下加快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研究”（SC23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利，男，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金融投资与财务管理。

方式方法有待优化、界别设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有待增强等问题。

(一)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当前,制度机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足,基础框架不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方式、频次、内容等缺乏统一规范,工作随意性大,难以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影响了资源下沉和服务效能。主动走访、互动协商、办实事等专项机制落实不到位,存在委员主动性不足、基层参与度不高、政策宣传不深入、形式主义等问题。跨部门联动协作效率偏低,政协内部存在信息壁垒、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与党政职能部门之间缺少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渠道,行政资源难以有效整合。

(二)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履职上,部分委员不深入界别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未建立民意收集反馈渠道,仅以岗位工作附带开展行业交流或者通过政协组织的调研、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等进行交谈,主动交心谈心、汇集社情民意等较为缺乏,陷入“说不上话”与“说不准事”的困境。提案建议上,部分委员不立足专业领域建言献策,热衷于跨界别发声,导致提案内容缺乏专业深度和可操作性。利益代表上,存在“代言缺位”现象,未能提炼和反映特定界别群体的特殊诉求,尤其欠缺新兴行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

(三)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

数字技术革命正深度重构政治参与生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5G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消解了传统政治参与的空间时间壁垒,更通过社交媒体、智能协商平台等载体,使界别群众的政治信息获取从单向接收转向算法推送,诉求表达从分散发声升级为结构化数据流,显著拓宽了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数字化接口。但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能尚未充分释放,部分地区缺乏系统的数字政协系统,基层存在平台建设碎片

化、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委员与群众互动停留于微信群的浅层连接。

(四) 界别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当前政协界别设置面临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在委员产生程序上,部分界别存在“精英化”与“荣誉化”取向,对基层群众的吸纳不足,工人阶级等关键群体缺席界别构成,造成界别设置代表性不足,削弱了政治协商的包容性。在组织渗透上,现有界别架构未能建立“行业—职业—阶层”三维动态映射机制,基层触角延伸不足导致“悬浮式代表”现象突出,形成“界别上层化”的结构断层。

(五)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渠道和平台有待进一步拓展

线下平台方面,虽然各地政协组织建立了委员之家、委员工作室、委员联系点等,但总体数量和覆盖范围仍有限,且部分平台的功能发挥不够充分,难以满足委员与界别群众广泛深入交流的需求。线上平台方面,虽然互联网技术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提供了新的手段,但目前线上平台的信息化建设不足,功能不够完善。部分平台存在分众化、差异化不足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吸引界别群众参与,且难以确保群众参与的可持续性。

二、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不足的成因分析

(一)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思想认识有待提高

部分政协委员在思想认识上政治自觉不足,对人民政协制度理论认知模糊,对界别代表本质与联系服务群众的战略价值把握不准,履职主动性欠缺。如职责定位上界别主体意识薄弱,混淆政治身份与群众角色,利益代表功能错位,造成基层调研不实、思想引领不力。同时,受“参政不行政”认知偏差的影响,议政献策的积极性不高;受“提案功利主义”影响,深入基层不够,群众基础薄弱、群众观念不强。

(二)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有待提升

政协委员能力建设与实际需求脱节,相关培训内容未能精准对接基层委员在调研分析、提案撰写等方面的实务短板,传统单向灌输式培训效果不佳,加上经费、师资等保障不足,实效不强;同时委员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部分委员文化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影响建言成果有效传递。界别联系机制在实践中存在明显短板,缺乏制度化、常态化联系渠道,沟通多为偶发、浅表式的,难以精准掌握群众诉求;部分委员因统筹能力不足,难以平衡履职与本职工作。此外,部分委员实践经验、责任意识不足,开展主动协商、民主监督存在畏难情绪,导致民意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未能充分发挥。

(三)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保障制度机制不够完善

政协委员提名推荐、履职评价与激励三项制度机制均存在短板。提名推荐机制虽有基础框架,但在程序透明、竞争引入、标准科学等环节仍需完善,易出现选拔力度不足、界别配置失衡、推荐责任虚化等问题,且“自上而下”的推荐协商模式易使部分委员产生身份认知偏差,重荣誉轻履职。履职评价制度不够健全,考核指标体系缺乏定量定性结合、过程成效统一的多维模型,存在规范不清、标准不细、激励不足、量化评估与表彰评选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同时评价成果运用不充分,未形成闭环管理,结果应用单一、共享不畅,与连任衔接不足、公开宣传不够,示范激励效应不强。激励机制相对薄弱,现有制度重考核、轻激励,刚性约束不足,缺少配套物质与职业发展保障,难以有效约束领导职务委员,也无法与委员资格评定、职务晋升实质性挂钩。

(四)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面临新挑战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多维度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呈现全域性特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

领域,驱动群众需求从物质满足向民主参与、法治保障、公平正义等方面延伸。因此,界别群众的需求也呈现出两个新特征:一是群体分化催生差异化诉求,界别群众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生活方式倒逼委员创新联系机制;二是数字化生存态势凸显,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要求委员联系工作突破时空边界。这些结构性变化对政协委员的诉求捕捉能力、数字治理能力、精准服务能力提出了新挑战,加大了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工作难度。

三、对策建议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准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政治方向

1. 将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委员深学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正确历史观与大局观,增强政治、思想、理论、情感认同;健全制度保障,发挥政协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将联系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年度协商计划、工作要点及向上级党委报告内容,统筹部署、督促落实,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全面贯彻。

2. 深化党员先锋引领界别纽带机制。构建辐射式履职生态,以党员委员为核心,建立“党员—党外委员”界别结对机制,形成“政协党组统筹、专委会实施、委员主体参与、界别小组联动”格局,推动联系工作组织化、常态化。建立双向贯通机制,开展联合调研与民情采集,畅通政治引领与诉求传导通道,完善“定期走访+专题协商+跟踪反馈”闭环机制。发挥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履职中组建功能型党组织,强化关键环节的组织保障。

3. 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提升党建赋能效能。各级政协在完善党组纵向领导架构基础上,横向拓展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与党员委员活动小组建设工作,推动与委员联系平台、界别小组深度融合,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组织网络,以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激活界别纽带功能,提升履职实效。

(二) 坚持“线下”“线上”平台建设双管齐下,创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渠道

1. 优化线下平台建设,构建实体履职服务矩阵。一是推进基层协商平台标准化,在乡镇(街道)、村(社区)规范建设协商议事室、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收集室,完善开放运行机制,常态化组织委员下沉开展调研宣讲、座谈调解、为民办事等零距离服务,提升联系频次。二是强化专委会纽带功能,建立“调研—协商—反馈”闭环,推行委员与界别群众“1+N”定向结对联系制度,依托界别调研、读书会等载体,深化思想互动与诉求反馈。

2. 数字赋能线上平台,构建智慧政协新生态。一是以“数字政协”综合平台为核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搭建智慧履职体系,整合建言资政、互动交流、信息共享等功能,建设工作数据库,创新“一界别一码一云室”线上联系机制,实现即时互动、全程跟踪。二是整合网站专栏、融媒体、远程协商等资源,开发界别精准识别的在线提案系统,打造网上会客厅、民意直通车、云读书会等智能空间,提供全流程线上履职服务。

(三) 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提升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专业水平

1. 强化“三种”意识,锻造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能力体系。一是强化政治意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政协、统战理论,提升政治素养与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能力。二是强化责任意识,立足界别、紧扣履职,主动亮明身份,结合专业特长开展活动、履行责任,树立良好形象。三是强化群众意识,践行群众路线,掌握工作方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从群众中汲取智慧,提升建言资政水平。

2. 构建多元培训体系,提升政协委员联系群众与履职能力。在培训安排上,增设新任委员岗前培训;在培训形式上,突破课堂教学、讲座等传统模式,运用模拟式、案例式、实践项目式等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培训实效;在培训内容上,围绕委员履职与联系群众的需求,系统开展调研、沟通、参政议政能力培训。

(四) 完善委员遴选机制,建强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队伍

1. 健全遴选标准体系。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建立主体资质与履职能力双重维度的遴选标准框架。在主体资质维度,明确“三必须”原则: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与民主协商精神,必须深度掌握所在界别行业生态与群众诉求,必须持续保持参政议政的热情。履职能力维度,要求委员必须具备突出的政治素养、界别认知、协商能力、成果转化力等。

2. 创新竞争性遴选机制。在委员产生阶段,引入适度竞争机制,推行“结构化差额遴选”制度,促使更多优秀人才参与竞争,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匿名化民主评议机制,对候选人的政治素养、履职能力、社会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评估。设置“双盲评审”流程,组建由政协专家、界别代表、第三方学者构成的复合型评审委员会,通过评审系统进行独立打分,确保评选过程公正、透明。

3. 实施公平公正的全流程遴选程序。构建“三公示”机制:初选名单公示(含候选人专业背景、履职素养、界别服务记录)、中期评估公示(展示履职能力测试成绩)、终审结果公示(附评审委员会综合评语),让界别群众全面了解候选人情况。此外,畅通界别内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真正落实将代表性高、综合素质强、议政水平高的优秀人士吸收到委员队伍中来的要求。

4. 健全准入退出动态机制。通过党组织把关资格审查,专业测试考察委员能力、部门联合委员廉政等,保证委员队伍的质量。同时严肃履职纪律,对已入选的委员加强监督管理,对不能履行职责、无法代表界别群众意愿的委员进行红黄牌预警,对预警持续未解除者,经常委会无记名投票启动退出程序。同步建立“候补委员人才池”,动态储备界别代表性强的后备人选。

(五) 健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履职考评机制,激发委员建言资政的内生动力

1. 健全考核机制,强化履职约束激励。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

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对各地的《政协委员履职考核办法》《政协街道联络组工作制度》等现有制度进行修订。同时,制定《优秀政协委员评选办法》《优秀政协街道联络组评选办法》,将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成效纳入履职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专项履职档案完整记录工作情况,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评选年度优秀委员以及换届时委员留任提名的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加强对委员履职的激励与约束。

2. 优化量化考评,保障考核科学高效。一是健全委员履职评价机制。精心设定涵盖参与调研、会议发言、提交提案等内容在内的关键考核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值架构,从而对各界别委员的履职状况展开全面、翔实的记录与精确的量化统计,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委员工作实际。二是优化考评方式及流程。将政协委员履职考评结果由年底统计反馈,调整为每半年公布一次。

(六) 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政协委员履职效能

1. 构建正向激励机制。一是完善荣誉表彰体系,建立分层级表彰制度,创设“双十佳”评选,将界别联系成效纳入履职全流程管理;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履职量化评估,开展优秀会议发言、提案、界别活动。二是创新激励矩阵,构建“精神激励+物质保障+发展赋能”三位一体体系,通过设立政协勋章、优先推荐参与重大协商、健全成果转化机制、组建先锋委员智库、打造跨界别经验共享平台,激发委员履职主动性与创新活力。

2. 健全履职约束机制。实行委员履职“红黄牌”预警制度,对界别联系不达标者启动诫勉谈话、限期整改程序。完善届中动态调整机制,对考核末位且整改无效者,经常委会审议启动委员资格终止、缩短其委员任期程序。

(七) 构建四级联动治理体系,推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履职下沉基层末梢

1. 建立四级协商处置机制。一是村级自主协商,推行“委员驻村”,每名委员固定联系1~2个村社,依托“院坝议事会”“村头调解室”每月开展不少于2次现场协商,落实“当

日接访、三日反馈”,就地化解简易矛盾纠纷。二是乡镇统筹协商,实行“双周收集、月度会商”,针对跨村复杂问题召开部门联席协商会,建立“民生项目库”,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年度实事工程。三是县级专题协商,组建重点问题攻坚组,围绕跨乡镇政策问题开展对口协商,开通“提案直报”绿色通道,重大民生建议直报县委决策。四是市级联动协商,建立季度督导机制,对疑难遗留问题联合调研,下发“问题交办单”,明确责任单位与办结时限。

2. 优化专业服务供给机制。一是组建界别服务团队,按专业设立法律咨询、医疗健康、农技推广等常设服务队,制定年度服务计划,开展送法进村、义诊、技能培训等常态化服务。二是建立结对帮扶制度,推行“委员联户”,每名委员结对3~5户困难家庭,实行“一户一档”精准帮扶,通过政协公众号开展“微心愿认领”。三是完善应急服务机制,组建防汛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队伍,制定平急转换预案,建立委员特长库,实现突发事件快速调配。

(八) 健全组织保障制度机制,优化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运行环境

1. 完善专委会枢纽功能。建立专委会统筹协调机制,按界别特征组建专业化活动小组,实行召集人负责制与联络员协同制。明确各层级委员参与规则,构建“专委会—活动组—委员”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制定界别活动标准化流程,规范调查研究、提案协商、民意收集等核心环节的操作规范。建立年度履职清单制度,将界别协商、专题研讨等规定动作纳入常态化工作机制。

2. 健全服务保障支撑体系。强化政协办公厅的服务保障作用,政协办公厅要为委员联系界别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同时,完善宣传引导矩阵,充分利用《民主协商报》、政协发布、政协网站、政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和社会主流媒体,广泛宣传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典型和经验,树立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良好形象。

(九) 构建覆盖全面、结构合理、运转高效的政协界别体系,夯实政协委员履职组织基础

1. 构建界别设置动态调整机制。一是建立

界别设置定期评估制度,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等,研判适配性,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构建科学评估指标体系。二是规范界别调整标准与程序,明确合并、拆分、新增流程,对职能交叉、覆盖重叠的界别归并重组,整合文化传播、科技创新等领域资源。三是健全新兴群体识别响应机制,跟踪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职业群体,研判其组织形态与发展诉求,搭建专项协商平台,保障其有序政治参与。

2. 扩大新兴群体界别覆盖范围。一是完善新兴领域界别设置。针对新经济形态发展需求,设立新业态从业人员专门界别,将网络直播、新媒体运营、快递物流、网约车服务等自由职业群体纳入政协协商体系,构建适应新型就业形态的参政议政渠道。二是建立跨界别协同协商机制,对涉及多领域的新兴议题,采取“主界别牵头+关联界别协同”的联动工作模式,提升复合型社会问题的协商效能。三是创新界别设置动态准入机制,建立新兴群体参政议政需求评估模型,对达到特定规模且形成稳定诉求表达的群体,依规启动界别增设程序。

(十) 创新多维立体化宣传引导工作机制,增强对界别群众的思想引领实效

1. 深化理论引导,筑牢思想根基。建立常态化理论宣讲机制,组建由政协委员、党校教师、基层模范构成的宣讲团,定期开展“理论进界别”巡回宣讲。编写《界别群众应知应会手册》,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百姓话”“界别语”。在社区、企业设立“协商文化角”,通过“委员微课堂”“理论故事会”等形式,结合界别特点解读惠民政策。

2. 强化情境引导,激发情感共鸣。打造“沉浸式”教育载体,在红色教育基地设立“界别共识实践站”,组织群众开展“重走初心路”体验活动。策划《界别记忆》口述史项目,邀请老委员讲述履职故事,拍摄《委员在您身边》纪录片,展现委员服务群众的真实案例。在重要节庆日举办“界别风采展”,通过实物展示、情景剧演绎等方式,展现各行业成

就与委员贡献。

3. 优化网络引导,拓展传播阵地。构建“报、网、端、微”全媒体矩阵,在主流媒体开设“委员有话说”专栏,定期邀请委员回应民生热点。整合政协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委员履职APP等平台资源,设立“民声直通车”互动板块,及时收集处理群众留言。制作《提案背后的故事》系列短视频,用真实案例展现协商民主成果。建立“优秀网络作品孵化机制”,发动群众参与创作快板、漫画等正能量作品,对传播效果好的作品给予表彰奖励。

(十一) 健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推进机制,激活界别纽带双向贯通效能

1. 规范界别活动制度。通过出台界别活动实施细则,系统规范活动流程、内容标准和服务保障要求,确保各界别开展活动时规范有序、高效运转,推动界别履职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各专委会每年至少组织所联系界别委员深入社区、农村、企业等基层开展1次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界别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2. 建立界别交流和联动制度。定期召开界别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期间组织界别小组会、联组会,围绕界别热点问题开展专题协商讨论;闭会期间探索建立界别深度协商机制,针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通过界别协商座谈会、专家咨询会等形式,围绕民生关切问题开展深度协商。

【参考文献】

- [1] 叶元俭. 人民政协推动民营经济人士政协委员履职路径研究[J].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4): 35-41.
- [2] 钟敏, 陈凌延. 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思考[J]. 政协天地, 2024(12): 31.
- [3] 林莉, 陈志伟. 多措并举 创新发展 深化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J]. 政协天地, 2024(12): 34-35.
- [4] 孙同军. 从工商联视角对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思考[J]. 协商论坛, 2024(10): 29-31.
- [5] 史世奎, 李浩然. 新时代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路径创新研究[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3): 58-65.

责任编辑: 龚 苏

以“情感相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基础与现实路径

张 凤¹ 武永江²

(长安大学 1.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维度,各民族情感相亲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历史传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情感相亲通过制度培育、记忆共享、文化共情、生活互动等机制,超越差异,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尊重、理解与认同,需进一步从制度保障、文化互动、教育引导、社会参与、媒介传播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情感相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民族一家亲”从政策目标转化为民族成员的情感自觉,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关键词: 情感相亲 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共情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6) 02-0048-06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1]。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情感相亲能够通过有效消解族群的情感隔阂,培育“差异包容、情感互通”的交往伦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次的情感基础。随着全球化与现

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需要应对发展不平衡、文化差异等挑战,但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如何构建更加紧密的民族关系,夯实人心基础,深化情感联结,成为学界和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情感相亲”的内涵释义

各民族情感相亲是指各民族成员在长期社会

收稿日期: 2026-02-15

基金项目: 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路径研究”(JDZ24008)阶段性成果;202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记忆研究”(2024P013)阶段性成果;2024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重点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的系统研究”(BNUSZPXZX24ZD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凤,女,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武永江,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长安大学)教授,陕西省委统一战线智库专家,陕西省中小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首批专家,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民族心理。

交往互动中,通过制度规范、文化共情、历史记忆共享、生活情感积累形成的相互尊重理解、互信互爱的情感纽带,其超越了民族身份差异,增强了情感共鸣,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2]。

(一)“情感相亲”是一种制度规范培育

制度性情感规范是指通过组织建设、政策设计和规范化程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化实践。这种培育形式将情感认同理念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这样一来,各民族情感相亲就从自发状态转向了自觉建构。例如,青藏铁路公司推行了“跨民族师徒结对”制度,除了传授专业技能外,还通过“每周学一句对方语言”等结构化安排,在日常协作中潜移默化地增进了民族成员间的信任与共情;云南多所民族中学实施了“三混”教育模式(即混合编班、混合住宿、混合活动),使跨民族交友率比传统分班制高出65%,情感认同指标也显著提升,有效打破了民族隔阂,巩固了民族团结的情感基础;国家层面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活动为成员带来了归属感,强化了集体荣誉感和情感联结。这些制度安排,从经济协作、教育融合到精神激励,以情感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3]。

(二)“情感相亲”是一种文化共情机制

民族文化共情是指个体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并与他们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的心理过程^[4]。这种共情不是简单的情绪模仿,而是基于文化解读—情感激活—结果评估的三阶机制运作:当人们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如节日、饮食、艺术)的情感价值时,“情感翻译”能力激活,如蒙古族“长生天”崇拜与汉族“天人合一”观念在自然敬畏情感内核上触发的跨文化道德共鸣,汉族参与藏族雪顿节时对仪式神圣性的共情体验。然后根据认知经验对当下产生的想法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理,即自身认知经验中缺少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认为当前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的共

同想法不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将不会产生;若评估结果为合理,即自身认知经验中对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认为当前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的共同想法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将会产生。

(三)“情感相亲”是一种历史记忆建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情感相亲的深层基础有赖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建构。这一过程通过挖掘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提炼文化基因、凸显情感记忆,在差异中建立认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共同体^[5]。这种记忆建构一方面包括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如抗日战争期间各族同胞携手共御外侮;四川泸定地震救援中,藏族向导不顾自身安危为救援队伍引路穿越断裂地带,随行汉族医生用简单藏语沟通伤情,开展紧急救治并安抚情绪。另一方面涵盖当代媒介对集体记忆的重塑,如影视作品《山海情》对闽宁协作的呈现。这类建构行为的核心在于将原先局限于某一群体或地区的历史,通过情感动员,转化为饱含温度与共情的“集体记忆”,纳入民族记忆工程,使之成为凝聚认同的宝贵资源,从而不断增强民族团结的情感内核。

(四)“情感相亲”是一种生活情感积聚

各民族之间的情感相亲未必一定基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微观互动中逐渐形成的^[6]。这种情感积累就像细雨润物,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重复的交往仪式和持续的空间共处,不知不觉中产生牢固的情感纽带。例如,昆明金星社区中多民族成员共同参与“民族广场舞”,不仅增强了体质,也成为日常情感交流的载体;大理古城中白族与汉族儿童一起玩“双语跳房子”游戏,在充满童趣的活动中传递文化认同;云南多民族混居村寨广泛采用“共生院落”模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居民互助与资源共享,形成情感共同体。除此之外,经济协作也促进了跨民族情感交融,如贵州千户苗寨等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经营者长期合作,形成了利益与情感的双重联结,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共情。

二、“情感相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

情感相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通过情感上的亲近与认同,推动形成持久稳固的共同体^[7]。情感相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超越差异,增强一体认同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在社会习俗、文化背景、语言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而“情感相亲”能够超越这些差异,增进一体认同。它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互动,如在同一个民族社区生活,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交融、共同参加传统节庆活动,如共同传唱《诗经》与《格萨尔王》史诗,共同庆祝春节与泼水节等多元节日;共享历史记忆,包括聆听抗战时期各族人民团结抗争的事迹,重读新时代脱贫攻坚过程中各族同胞携手奋斗的经历,自然生成对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情感共鸣,在情感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二) 化解偏见,助推社会和谐

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域隔阂与刻板印象,可能引发不同民族间的误解甚至冲突,而“情感相亲”则借助深层的情感共鸣和真诚的人际交往,成为化解偏见、促进融合的重要工具。不同民族成员通过跨民族通婚组建家庭、在多民族混居社区密切交往、共同参与节庆文化活动并频繁互动,打破族群局限,在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中,熟悉彼此的情感表达,逐步消除偏见,积累人际信任。这种源自日常经验的情感联结,不仅有效地消解了群体间的疏离与误解,更在微观层面增强了社会的内在凝聚力。

(三) 强化共识,深化情感联结

政策法规为民族平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真正的民族团结唯有植根于内在的情感认同方能持久。“情感相亲”使民族团结从外在的“要我做”升华为内在的“我要做”乃至“我想做”,让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民族成员的自觉追求。在共同应对重大挑战过程中,如汶川地震时

各族救援队伍并肩奋战;云南漾濞地震后多民族共同重建家园;脱贫攻坚战中东部省份与西部民族地区结对帮扶,各民族成员通过守望相助、同甘共苦的真切实践,深刻体验休戚与共的命运关联。这种基于共同奋斗的情感联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认同。

(四) 凝聚力量,共筑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体成员凝心聚力、同心同行,而“情感相亲”正是激发这种共同奋斗精神的重要源泉。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多民族共建,还是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江、黄河流域各族群众共同参与保护治理,情感上的相互认同与信任都能够有效消除隔阂、促进合作。在文化领域,各民族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携手创作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时代文艺精品,持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这种基于情感共鸣的凝聚力,不仅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注入稳定而持久的内生动力,更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成为扎根于各民族心灵深处的共同向往和自觉追求。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相亲”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各民族情感联结深厚,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

(一) 空间上的共生互动

中国地域辽阔、山川纵横,然而并未阻隔各民族交往,反而因其多样性促成了互补共生的关系。历史上,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通过“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产生了持久的经济共生关系。例如,唐代在陇右、河西一带设立“互市监”,宋代在西北地区推行“茶马法”,用中原的粮食、茶叶、丝绸换回草原的毛皮、马匹、乳制品,这种经济依存逐渐超越了简单的交易,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互补,共同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作为跨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物质交换,还推动了深层次的

文化融合。例如,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龟兹乐舞融入唐代宫廷燕乐,吐蕃与唐通过“甥舅和盟碑”确立了政治文化互信。这种由地理空间的共生开始,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进行持续互动,加深了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联结^[8]。

(二) 政治上的“大一统”传统

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大一统”传统,为各民族情感相亲奠定了政治基础。历代王朝通过和亲政策不仅有效缓和了民族矛盾,还建立起超越血缘的情感纽带;在治理模式上,唐宋时期在边疆推行的羁縻制度与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在尊重当地民族自治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贡赐、册封等仪式进行互动,强化了其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至清代,“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趋于成熟:朝廷通过满蒙联姻巩固了北方联盟,通过尊崇藏传佛教、册封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实现了对青藏高原的有效管辖。这些政治实践展现了“因俗而治”的智慧,更从制度层面将各民族成员纳入共同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的情感凝聚力。

(三)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历史上持续深入的经济交流,为各民族情感相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传统商贸体系,在汉、藏、蒙古、回等民族间构建了紧密的依存关系:唐宋设茶马司,以中原茶叶、布匹交换藏区马匹、蒙古族地区皮毛;明代仅川藏茶马古道年运茶量就达数百万斤;清代张家口、恰克图成为汉蒙俄贸易枢纽,形成“北方丝绸之路”繁荣网络。同时,大运河贯通南北,输送漕粮,促进沿线各族商旅、工匠的流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铃响,串联起云南傣族、白族与西藏藏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沿途市镇如丽江、打箭炉(今康定)成为多民族混居、文化互嵌的节点。这种经济互补与共同奋斗,不仅满足了物质需求,更在共享成果、共克时艰中深化了情感认同,为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持久的内生动力。

(四) 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传统。汉字作为通用文字,不仅被女真、契丹等民族借鉴创造文字,汉语更是在漫长交流中融合了“戈壁”“胡同”“饕”等大量民族语汇,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宗教层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汉地消化与哲学重构,形成汉传佛教体系;后向北传至藏、蒙古族地区,融合当地信仰,形成藏传佛教独特的传统,五台山也因此成为汉、藏、蒙古族佛教徒共同朝圣的圣地。艺术与生活层面,唐代盛行的胡旋舞源自西域康国,在长安宫廷风靡一时;元代的回回乐融入了中亚伊斯兰音乐元素,推动了中国乐器的多样化进程;清代的满汉全席则完美融合了满族烧烤与汉族菜系的精髓,成为中华宴席文化的典范。这些文化互动广泛而深入,渗透在价值认同与情感构建中,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基础。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相亲”实践路径

“情感相亲”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其巩固与深化需要从制度设计、文化互动、教育引导、社会参与、媒介传播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具体而言,可从以下路径展开实践:

(一) 制度保障: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制度保障是巩固“情感相亲”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路径。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其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的基础上,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配套法规的修订完善,优化自治机关运行机制,健全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政议政制度,确保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其二,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制度设计,建立更加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支持政策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民族地区发展需求挂钩机制,重点实施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特色优势产业培育计划和民生保障专项行动,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其三，构建全链条反歧视制度框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中细化民族平等条款，建立涵盖预防教育、监测预警、快速处置、救济补偿的民族歧视防治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其四，推进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用的双语服务体系，构建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均等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与执行，使“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真正转化为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

（二）文化互动：促进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

情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既是个体的内在资源，又嵌入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而人际关系的深化必然依托于具体的文化互动实践。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不同群体搭建了情感交流的桥梁，由此形成的亲密关系网络是促进各民族情感交融、心灵相通的宝贵资源。在制度文化层面，可在国家层面搭建制度性文化互动平台，开展“中华民族团结进步文化周”等系列教育活动，并鼓励地方打造地域特色文化交流品牌，定期开展交流互鉴；在物质文化层面，应系统推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合作开发民族手工艺联名产品、共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方式，实现经济合作与文化共享的双赢；在数字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字文化馆”的建设很有必要，运用VR/AR技术复原重大历史事件场景，开发多民族语言版本的民族团结网络课程，能够突破时空局限，达到文化共享的目的。这些方式通过构建“传统+现代”“实体+虚拟”的文化互动矩阵，能够真正实现各民族从形式上的交流走向情感上的交融；在精神文化层面，要创新实施“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培育工程，精心打造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汇》等文化精品，以多彩文艺形式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三）教育引导：培育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

教育引导作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

基础的关键手段，需要构建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教育工程。在国民教育方面，应构建“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体系，采用“专题教育+学科渗透”双轨模式，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系列统编教材，运用“课程思政”实现浸润式培养。高等教育领域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民族院校与“双一流”高校建立“1+1+N”协同发展联盟，实施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尝试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博士点，培育兼具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的领军人才。社会教育层面需构建“实践活动+基地网络+数字平台”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重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教育基地，精心开发民族地区研学旅行线路，运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要突出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建立“理论研修+实践锻炼+国际交流”的教师发展机制，培育一支政治坚定、学养深厚、善于创新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同时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云平台”，开发智能教学助手和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民族团结教育”新生态。这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能够系统培育青少年的共同体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持久而深厚的情感根基。

（四）社会参与：激发民间自发的团结力量

社会参与的有效性取决于多层次参与体系的系统建构与持续优化。其一，着力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生态，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促进“民族团结促进会”等社区自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鼓励开展“邻里节”“百家宴”等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群众活动，以增强社区层面的互动黏性；其二，注重成功经验的模式提炼与推广，通过系统总结“结对认亲”“混班混宿”等创新实践的运作机理，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民族交往标准化范式；其三，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反馈机制，设立“民族团结之星”等多元化评选体系，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先进典型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其四，创新社会参与载体，探索设

立“民族团结公益创投”专项基金，重点资助民间团体开展文化互鉴、扶弱帮困等具有示范效应的公益项目，形成政府引导、社会运作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立体化的参与体系能够有效激活社区、学校、企业等社会单元的参与活力，在微观层面形成“人人促进团结、人人维护团结”的社会认同，最终使“情感相亲”理念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五）媒介传播：构建积极正向的舆论生态

数字媒介时代，个体的所见所感会瞬间转化为无数网民的共同体验，这种情感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叠加、共振，最终形成“群情沸腾”的社会心理现象。因此在构建积极正向的舆论生态过程中，媒介传播应当构建系统化、创新型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其一，在内容创新维度，重点打造《石榴籽故事》等系列融媒体精品，通过微纪录片、动画短片、互动 H5 等多元形式，生动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其二，在渠道建设方面，着力构建“中央媒体引领、地方媒体联动、新媒体平台辐射”的立体传播矩阵，重点培育一批粉丝量百万级的民族团结主题短视频 IP，形成网络传播热潮；其三，在技术赋能层面，研发多民族语言智能互译系统和沉浸式 VR 文化体验项目，运用 AI 主播、元宇宙等技术手段突破传播壁垒；其四，在舆论引导环节，建立健全民族领域舆情监测预警机制，组建专业网络评

论员队伍，及时澄清谣言谬误，同时创新开设“民族对话”网络直播专栏，邀请各族各界代表畅谈交流。通过这种内容精品化、渠道多元化、技术智能化、引导精准化的四维协同传播体系，持续凝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撑^[9]。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02).
- [2] [7] 赵继龙. 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坚强纽带与实践指向——基于情感政治的分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5 (2): 67-75.
- [3] 罗强强, 王燕子.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中的情感培育：以新疆“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实践为例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 (6): 12-19.
- [4] 陈立鹏, 薛璐璐. 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探析 [J]. 民族研究, 2024 (4): 1-11+134.
- [5] 李建军, 李宗赫. 以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J]. 民族学刊, 2022, 13 (11): 1-8+141.
- [6] [9] 李振逸, 闫奕澎. 历史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之维探析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3): 84-89.
- [8] 杨艳, 王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逻辑与实践：基于剑川个案的研究 [J]. 民族论坛, 2024 (2): 52-61.

责任编辑：李 蕾

厚培文化根脉，留下千年传承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方法研究

史永哲 宋 锋

(西安开放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2)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实证，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构建了全球瞩目的非遗保护体系，但县级非遗资源作为我国非遗资源的底部，其保护难题的解决关系我国非遗保护全局。为此，县级非遗保护应以数字化为抓手，推动县级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以提高大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促进县级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开展，助力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推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 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6) 02-0054-06

引言

当今世界，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体现，更是一国国家凝聚力、国际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含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四个自信”和“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新兴大国，文

化传承发展的目标是让“中华文明”从“历史符号”转化为“当代影响力”^[2]。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留下了大量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宝贵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本质上就是保护文化的根脉与生命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十分重要。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光耀古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且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以其瑰丽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新时代，

收稿日期：2026-02-15

基金项目：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2025—2026 年度非遗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2025-FYYB-050S）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永哲，男，西安开放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数字技术应用及非遗保护；宋锋，女，西安开放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及宣传思想文化。

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活化石，是传统文化的映射和物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必须先从保护文化遗产做起。在文化遗产保护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数量巨大、存在领域广泛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3]。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现了特定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追求，是民族文化及特色的重要体现。

（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

学术界根据非遗保护的标志性工作的开展，将我国的非遗保护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遗保护萌芽阶段，时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末期，标志性工作有：对一些民族、民间文艺进行调查，收集、整理，以及记录一些传统的民歌、戏曲、舞蹈、谚语等传统文化素材，形成可以保存留传的文化典籍。第二阶段为进入21世纪的前5年，这是我国非遗保护国际化的开始阶段，标志性工作有：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首次启动全国非遗普查。第三个阶段为2006年至今，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制度化的阶段，标志性工作有：2006年国务院公布首批518项国家级非遗名录，确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设立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11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成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从以上非遗保护的发展历

程来看，我国对非遗保护工作逐渐重视，不断加强，保护成效越来越显著。

（二）我国非遗资源存有现状

我国的非遗资源数量巨大，截至2024年底，我国非遗资源统计总量近87万项，已经认定的国际、国家、省、市、县五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4]。根据非遗项目注册机构的类别，将非遗资源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五种类别。其中，国际级非遗项目指的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非遗资源。到2024年底，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该名录。国家级非遗项目是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并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截至2024年底，我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共有1557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是指由相应级别人民政府认定并公布的，在其行政区域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我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有1.4万项，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3万余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6万余项。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的重要论述

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非遗保护传承作出重要指示。2019年8月19日在甘肃敦煌研究院座谈时他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10月12日在潮州市广济楼考察时他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2024年习近平在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章，系统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可见，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念念不忘于心，十分重视。

二、非遗保护的方法

我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性政策、全民参与、教育融入及文旅结合等方式，构建了全球瞩目的非遗保护体系。

（一）非遗保护的顶层设计

我国对非遗保护工作从顶层设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保障层面。我国 201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全球少数为非遗保护单独立法的国家之一。所有省级行政区相继配套出台了地方性非遗保护法规，形成“国家—地方”法律网络。如陕西省在 2014 年颁布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结合陕西特色对非遗保护制度进行了细化，并于 2023 年启动修订调研，增加数字化保护、乡村振兴衔接等条款。

2. 政策规划层面。2005 年，国务院首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了非遗数字化、活态传承的目标。这些政策规划明确了非遗保护的目标要求，促进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3. 机构设置方面。我国成立了非遗保护的专门机构，即在文旅部设立非遗司，负责指导开展国家层面的非遗管理与保护工作。各省市级政府均成立非遗保护中心，隶属于省市级政府文旅主管部门，县级文旅机构均设有负责非遗保护的专职人员，实现了多层级管理和全面覆盖。

（二）非遗保护的实施方法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路径和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 建立非遗名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非遗保护的重要一步，通过建立非遗名录，对非遗项目进行收集、遴选和整理，为非遗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基础。我国建立了全球最

全的非遗名录体系，涵盖国际、国家、省、市、县 5 级体系，收录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

2. 建立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和地方出台专门政策文件，对非遗传承人进行资助和保护。如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补贴，数额从 2008 年的每年 8000 元，提升到 2023 年的每年 3 万元。各省市设置的非遗传承人补贴数额每年在 2000—20000 元之间，县级非遗传承人补贴数额每年在 500—5000 元之间。

3. 开展数字化非遗保护。我国十分重视数字化在行业中的应用，各级政府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条例中，都将数字化保护列入其中，并要求对濒危非遗项目优先数字化进行抢救性保护。目前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我国已完成绝大多数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字化建档，建成全球最大非遗数据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此外，很多非遗保护组织和团体都积极尝试用最新技术来保护非遗项目，采用 AR、VR、3D、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模拟和还原非遗项目，实现对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

4. 开展非遗文化教育。非遗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与活态基因库，其保护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非遗进校园”工程已开始实施，截至 2024 年，全国 90% 中小学开设非遗相关课程，京剧、广东醒狮等内容进入教材。此外，中央美院等 38 所高校设立非遗相关专业，涵盖传统手工艺、非遗文创设计、表演艺术、传统戏剧、民俗遗产管理、非遗与产业融合等。

5. 以文旅融合方式促进非遗保护。近年来，各级政府重视文旅融合，非遗作为各地的特色文化，同当地的旅游项目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至 2024 年底，全国打造 200 多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非遗文创产业年产值超 1 万亿元^[5]。此外，各地建立非遗工坊，以非遗工坊来促进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促进就业、发展当地经济的作用。截至 2024 年，全国建设 2500 余个非遗工坊，带动地区就业超 50 万人^[6]。

以上方法仅为目前非遗保护工作中采用的典型方法,在实践中,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使用的方法还有很多,这些方法都能较好地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法

县级非遗项目位于我国非遗资源金字塔的底部,基数十分庞大,目前主要以县域为单位进行保护,覆盖地域较小,关注人群较少,获得的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保护难度较大。在保护方法上,被大家公认的、最为有效可行的方法是数字化保护方法。

(一) 数字化保护的优势

数字化时代,数字信息已步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尤其深得年轻一代的喜爱。数字化资源具有低成本、类型多、易复制、易保存、易传播的特性,因而在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数字化保护方法成为公认的首选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1. 制作成本低,操作方便,易于保存。我国目前智能手机、电脑、互联网络等信息设备已经普及,多数人能熟练应用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因而对县级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保护成效较好。此外,数字化保存不需要专门的人员和场所,成本较低。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用3万元预算完成20项濒危非遗的影像记录,平均成本仅1500元。浙江安吉县通过数字化手段,2年内完成126项县级非遗全记录。

2. 形式多样,传播便捷,受众面大。非遗数字化保护资源的呈现形式有多种选择,可以是文本、图形、图像,也可以是音频、视频及3D动画等。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平台,可以实现便捷宣传与传播,可让受众人群大幅增加。如福建省惠安县用闽南语短视频推广“惠安石雕”,播放量超百万^[7]。陕西凤翔泥塑通过直播销售,年产值从50万元增至800万元^[8]。

3. 吸引年轻群体,大众喜闻乐见。在我国,互联网及短视频平台的应用,已经成为年轻群体

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以及使用上的操作便捷化,手机应用已经成为众多人群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内容。因此将非遗数字化保护资源在互联网及自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必然会吸引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众多人群的关注,达到良好的宣传和传播效果。

(二) 数字化保护的标准及要求

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标准及要求主要是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实现目标及实现方法进行的限定,旨在使用数字化手段对非遗项目实现标准化、系统化的还原和保护。

1. 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的要求。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的非遗保护方面的政策文件,对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总体要求。各省市则制定相应的配套规范,明确地方非遗保护的数字化要求。这些文件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2. 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技术标准。非遗数字化保护在技术标准上并无统一要求。部分省市的非遗保护条例对此略有提及。各地在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中总结了一些技术标准和经验,可作为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技术参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采集。非遗数字化保护在数字采集上要求精准、真实地获取数据信息,记录过程要求全面详实,数字采集要求多角度、全方位,尽量采集到高精度、真实有效的信息数据。如采集故宫“古书画修复技艺”时,进行多机位高清拍摄,同步采集音频、动作数据。保护老电影京剧《贵妃醉酒》时,采用了8K超高清修复保护等。二是信息呈现。非遗数字化保护在信息呈现上要尽量做到画面清晰,色泽鲜明,分辨率高。呈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可采用文本、图像、音频、视频、3D建模、虚拟现实等形式来呈现。通常的信息呈现有以下几项精度要求:视频:4K/8K分辨率,HDR色彩,立体声录音。图像:RAW格式,像素 ≥ 2000 万(用于纹样、器物细节)。三维建模:精度达0.1mm(适用于建筑、雕塑等)。以上技术标准要求并非固定不

变的,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呈现标准也会不断提高。因此,在开展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时,应尽量使用最新技术,做到同技术发展与时俱进。三是存储与管理。非遗资源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是数字化保护的重要环节,是数据安全的重要内容,是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成果所在。因此,做好非遗数字化资料的存储与管理十分重要,此环节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多备份存储:对数字资源进行多备份,分布式存储,增加数据的安全性。区块链存证: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增强数据存储的安全性。云端备份:云平台集中存储,提高数据保存的安全性。

(三) 县级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实施方法

县级非遗项目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且多具有本土化、小微化特点,数字化保护需结合基层实际,根据“信”“达”“雅”的还原要求,采取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易实现的技术手段,充分调动大众的力量来实现。因此,县级非遗的数字化保护,要利用便捷有效的设备和简单易用的软件及操作方法来实现。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软、硬件工具。县级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采用的软、硬件工具不需要特别高端,只要能够达到较好的精度及清晰度要求,就可以拿来使用。硬件工具可以采用较新的智能手机,只需能够录制 4K 高清视频,且具有一定的媒体编辑加工能力就行。有条件的,可以采用数字单反相机来采集图像、视频数据。对于方言唱诵、口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保护,最好采用音频精度更高的专业麦克风,如大疆 Mic、罗德麦克风等。软件工具较为丰富,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音、视频及图像采集编辑手机软件有:数据采集软件(一甜相机、美颜相机、Filmic Pro 等),数据编辑软件(剪映、必剪、快影等)。使用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及熟练程度,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件工具。

2. 数据采集与加工。在已有的软、硬件条件下,非遗数字保护在数据采集与加工方式上应尽量做到专业和细致。在操作中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尽量熟悉软、硬件的功能,并灵活恰当地应用这些功能;二是通过合适的方法,将软、硬件工具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到质量较高的图像及音、视频资源,并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进行加工。三是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多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质量较高的非遗保护数字资源。

在数据采集方面,对技术工具、传统技艺、工艺流程、材料配方等类型的非遗项目,应选择具有 4K/8K 拍摄精度、微距摄影、3D 扫描等功能的软、硬件工具进行采集;对表演艺术、曲谱、服饰道具、动作分解等非遗项目,应采用具有高清摄像功能的软、硬件工具,采用多机位拍摄、慢动作捕捉等方式进行采集;对口述传统方言发音、唱腔、谚语、故事等非遗项目,则可采用高保真录音软件进行采集。对民俗仪式、时空场景、文化语境等非遗项目,应采用多机位、360 度全景拍摄方式进行采集。

在数据加工方面,除了使用功能较强的编辑软件,还应特别注重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人等新技术的使用。通过这些技术,可以生成包含多种形式数字人的视频及 3D 动画,并能自动添加字幕,让视频及图像的画面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助力加工出较高质量的非遗保护数字资源。

3. 存储保护及宣传与传播。县级非遗保护数字资源的存储,既可以采用本地化多点存储,也可以存储在相关的云端,还可以交由县级非遗主管部门进行鉴定和存储^[9]。县级非遗项目的宣传可优先选择互联网、自媒体等平台。互联网宣传通常采用网站形式,网站内容涵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类型媒体,具有稳定、长效的宣传功能。自媒体平台,通常指的是如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允许个人发布媒体信息的平台。这些自媒体平台因让普通人也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深受大众的喜爱。目前使用自媒体平台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其上开展宣传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如 2024 年 3 月,咸阳市武功县的一家旗花面餐厅,在抖音平台上对

县级非遗项目“武功旗花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营销宣传，当月该餐厅的旗花面销售额猛增5倍，利润增加3倍。此举也对“武功旗花面”这一县级非遗项目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结语

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载体和实证，是一个国家文明历史的象征，了解我国非遗知识及非遗资源和保护工作的状况，对民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十分重要。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非遗保护工作面临的难点问题，研究总结县级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大众化方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县级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中来，并实现线上宣传、传播，对解决当前非遗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我国丰富的非遗资源现状及非遗保护历程，以及政府在此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总结了县级非遗资源数字化保护和传播的较为有效的方法，旨在解决当前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增强大众的非遗保护意识，提升我国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5 (02).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5-22.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EB/OL]. https://www.npc.gov.cn/zgrdw/huiyi/1fzt/fwzwhycbhf/2011-05/10/content_16660.htm.
- [4] 周玮. 从执法检查报告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成效 [EB/OL]. (2024-11-0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4933.htm.
- [5] 闵庆文, 张晓莉. 中国乡村遗产旅游发展报告 (2024) [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4-20.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24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5/content_7044342.htm.
- [7] 陈志强, 林雅雯. 闽南地区非遗数字化传播案例研究: 以惠安石雕为例 [J]. 民俗研究, 2024 (9): 89-102.
- [8] 王艳, 李军. 直播电商赋能传统工艺传承: 以陕西凤翔泥塑为例 [J]. 文化遗产, 2024 (8): 45-48.
- [9] 李明, 张晓华.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存储与安全保护技术研究 [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24 (4): 156-163.

责任编辑: 马文婷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

——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路径分析

张进蒙 张思宇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新征程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重要方式。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新型举国体制通过资源整合、制度创新以及路径驱动等机制，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及未来产业前瞻性布局，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 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现代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6) 02-0060-05

自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学界围绕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1]。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中，新型举国体制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制度保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以实现产业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系统分析新型举国体制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制度创新与路径驱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并致力于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

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一)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2]。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新要求，新型举国体制正是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形成的上层建筑。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创造性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已经建立起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3]，新型举国体制是“举国体制”在新时代

收稿日期：2026-02-15

作者简介：张进蒙，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张思宇，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代的创新发展，其核心在于国家统筹协调，以实现多维资源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

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具有明显差异。传统举国体制主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来集中全国资源以完成重大战略任务，在实际运作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新型举国体制则以国家为主导，注重市场和社会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局面，使其更好地与现代科技革命相适应，更高效地进行资源整合以提高生产率，为实现我国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阐述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4]。新时代生产力三要素正经历数字化转型与重构：劳动者数字化转型体现在现代劳动者在掌握传统劳动技能的基础上，还需具备运用新兴数字技术的能力。劳动资料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于工具智能化和自动化，如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劳动对象数字化转型则体现在原材料智能化管理和产品智能化设计方面，通过物联网技术使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和存储实现智能化管理，产品智能化设计使产品不仅具有传统使用功能，还具备智能化的交互功能。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核心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交通以及金融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生产率的提升，还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质生产力注重产业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应用新能源技术和环保材料，致力于实现高效能、绿色化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发展瓶颈，推动生产力实现质态跃升，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动能，使我国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前列。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与表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5]。在当今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展现出新的内涵与表征。现代化

产业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以高效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由各产业部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具有高度创新性、协同性和竞争力的有机整体。它不仅仅是各产业的简单集合，更是通过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来实现经济整体效能最大化的复杂系统。

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供给，减少外部技术依赖，达到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的产业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强调要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其所呈现的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的发展趋势，能够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与升级、产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以及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产业新形态。

二、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一）资源整合机制

为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型举国体制采取高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来实现跨部门和跨机构人员调动，汇集各地人才资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保障。这一机制打破了传统资源流动壁垒，使集中优势兵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可能。2025年首批10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合体”挂牌运行，实现跨地域与跨机构的科研资源共享。在“嫦娥探月工程”与“北斗导航系统”项目中，资源整合机制的成功运用，汇集了全国各领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共同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新型举国体制在运用资源整合机制的同时也注重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从而实现资源协同效应最大化。为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化，新型举国体制通过搭建技术共享和转化平台，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精准对接服务，以加快技术产业化，提高技术转化率。这种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极大提高了技术成果的转化

率与经济效益。

（二）制度创新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制度创新为重要推动力，新型举国体制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采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能力及促进要素流动等方式。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来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和明确数据产权归属等使数据交易在法律保障下有序进行。2025 年《数据产权登记与交易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明确了数据资产入表路径，推动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数据交易所”，全年数据交易规模突破 300 亿元。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主体积极性，保证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使科研成果与企业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创新率与成果转化率。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制度创新相互促进并形成螺旋上升的动力机制。其一，制度创新打破旧制度束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环境；其二，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制度需求，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各国不断完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法律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种良性互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制度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多制度保障，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路径驱动机制

路径驱动机制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重要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多元动态的推动路径。不同发展路径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市场需求驱动型创新路径在人工智能领域最为突出。我国于 2025 年实施首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计划，力推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养老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并预

计在 2027 年形成千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和智能安防等消费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的智能化生活需求，不断优化算法和硬件性能，从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发展与技术迭代升级。

多元动态的推动路径闭环创新型持续迭代路径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得到充分体现。上述多元路径不仅强调全链条上的持续创新迭代与改进，还更加注重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我国通过《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改造，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企业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利用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实现产品的持续迭代升级。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路径驱动机制通过技术迭代和产业孵化，并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些路径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领域实现双向互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

（一）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

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制造业向高端价值链迈进的重要举措。《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要通过技术改造、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2025 年工信部启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推动超过 10 万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武集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建成并投运了全球首座“零碳高炉”，以此实现了钢铁冶炼全过程的碳中和。宝武集团的数字化转型表明，企业要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与降低成本，必须通过智能化改造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来增强市场竞争力。

政策支持下的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还强调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与新材料，促使企业实现节能减排和

资源高效利用。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协同，构建了更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这一转变显著提高了全产业链的效率和竞争力，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其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新能源产业主要涵盖太阳能、风能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相比于传统能源具有资源分布较广、环境破坏性弱及开发利用潜力大等优势。新能源产业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宁德时代，其在 2025 年发布的新一代“凝聚态电池”，标志着电动航空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其在新能源产业集群方面的发展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优秀范例。为满足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续航与安全的需求，宁德时代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动了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展。

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有效推动了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作为行业龙头，宁德时代通过其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壮大，促进了全产业链的整合与升级，既为新能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又带动了多产业协同发展，进而提升了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竞争力。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环节，新能源产业规模化不仅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更为落实“双碳”目标、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三）未来产业前瞻性布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当前新兴产业发展蕴含巨大潜力，如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基因编辑和细胞治疗等技术为疾病治疗提供了新手段和新思路，推动了化工、医药和材料等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深远影响。推动未来产业前瞻性布局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催生出商业

新模式和新业态。

2025 年科技部启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专项，推动 AI 在药物筛选、合成生物学中的应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成功实现高位截瘫患者通过脑机接口控制外骨骼行走，标志着我国在脑机融合领域进入国际第一梯队。该技术使瘫痪患者实现对外骨骼的控制，为残疾患者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未来产业的发展还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人才结构调整优化。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即未来产业前瞻性布局，通过加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和应用，推动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突破和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四、挑战与对策：制度适配与风险防范

（一）实践困境

传统路径依赖与要素配置低效问题较为突出。以新兴前沿技术脑机接口为例，该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人才与技术支持，但当前政策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仍存在不足，传统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成熟产业，对于前沿技术的投入相对有限，使得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还难以满足该技术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人才缺口较大成为阻碍技术突破的一大障碍。

国际技术封锁与产业链安全问题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在半导体和高端软件等关键领域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使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困境，产业链安全遭到威胁。尽管新能源产业在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等问题。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受到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储能技术落后等因素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优化路径

针对前述困境，政府需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政

策引导与支持,完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应积极履行职能,为发展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如设立国家专项研发基金,优先攻关脑机接口关键技术,促进技术突破;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加大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支持力度;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高校跨学科课程体系,推进龙头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建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和长周期培养机制,为新兴产业培育更多复合型人才,从而推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在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应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全方位科技创新合作格局与开放平台,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提升我国全球科技创新影响力与话语权。要平衡国际科技合作与自主创新,避免闭门造车,借助国际创新资源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我们还应不断强化数据安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其安全性与隐私性直接关系到市场效率与发展,为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出台相关数据管理条例,明确数据权属和跨境流动规则,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性,从而减少数据滥用和泄露带来的外部冲击。通过上述政策调整,推动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语

“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新型举国体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系统性、全方位的有力支撑,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机制,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在人才培养与引进、科研项目组织到成果转化应用等各环节,构建高效灵活的制度框架,使创新主体协同更加顺畅,创新资源得以优化配置,极大地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新型举国体制能够跨部门、跨地区汇聚人力、物力等各类资源,形成强大合力,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8.
- [2] 周文,何雨晴.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2024(4):3-15.
- [3] 马荣花.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内涵表征、逻辑理据与独特优势[J]. 企业经济,2025(3):49-58.
- [4] 唐正东. 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新境界[J]. 新质生产力研究,2024(4):15-26.
- [5] 陈梦根,张可.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 改革,2024(6):58-69.

责任编辑:黄晓翠